

#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中文系

## 苏轼通判杭州的际遇与文学创作 之考辨

科目编号：ULSZ 3068

学生姓名：许美琪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余曆雄师

呈交日期：2013年4月5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 苏轼通判杭州的际遇与文学创作 之考辨

##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资料，皆已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10AAB02939

日期：2013年4月5日

## 摘要

熙宁期间（1068-1077），王安石全面施行以“富国强兵”为最终目标的新法。然而，在施行期间，新法所出现的弊端却使人民未受其利先受其害。所以，苏轼于熙宁二年（1069）上《上神宗皇帝书》论新法“不便”之处，次年再上《再上皇帝书》论新法不可行之处。然他这举动却引起了王安石的不满，最终使他遭致谢景温所劾，被诬奏贩卖私盐。事后虽已查明真相，然而，朝廷已非苏轼可容身之处，为避开政治漩涡，遂上书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六月，苏轼以太常博士直史官通判杭州。

作为杭州通判，苏轼以实际行动为人民修浚六井，解决当地人民的水源问题，并且使他们免受干旱的祸害。在《钱塘六井记》中，苏轼就记载了他与陈襄二人修浚六井的整个过程。从苏轼帮助杭州人民修浚六井的过程中，无不透露出他经世济民的精神。然而，作为一位诗人，苏轼在杭州西湖朝夕相伴之下，写下了许多吟咏西湖景色的诗词。而在本论文中，笔者只引用了其主要的“西湖诗”，如《饮湖上初晴后雨》、《夜泛西湖五绝》、《湖上夜归》、《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及《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在“西湖词”方面，笔者则引用了《菩萨蛮·秋雨湖上萧萧雨》以作补充论述。在苏轼这些咏西湖之作中，他除了写出西湖景色的四时变化、晴雨、夏天阵雨、将雪未雪的冬天及月夜之外，他在诗歌中寄托着对新法不满的看法及心情的表露。除此之外，他还透过西湖的景色的刻画来透露出他与友人分离的离愁别绪之感。故此，杭州西湖经苏轼的点染刻画后更添异彩。

在通判杭州的这三年里，苏轼无论在政绩或者在文学上都有所发展，当中，尤为钱塘六井及杭州西湖最能明显展现他两方面的成就。透过杭州时期的作品与杭州事迹的结合论述，不仅看出通判杭州对他仕途及文学的影响，也可以看出他对杭州及西湖的浓厚之感情。在本论文的苏轼阶段性研究中，所能看出苏轼在通判杭州的事迹及文学发展，仅限于熙宁期间。然而，在此后的研究，除了熙宁年间，还可尝试对元祐年间苏轼的杭州事迹及文学创作进行研究。再者，由苏轼通判杭州的研究可推至苏轼在密州、徐州、黄州、海南岛诸州的研究。

**关键词：**苏轼；自求外任；通判杭州；钱塘六井；杭州西湖

## 致谢

中文系，不归路。何以见得？从一开始的抗拒到接受，至今毕业将即，笔者想大声说：“选择中文系，我不后悔！”这一路走来，笔者曾想过要放弃，然而在“不经一番寒刺骨，焉得梅花扑鼻香”这道理鞭策下，笔者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此时此刻，终于到验收成果时候了，这番心情真的非笔墨可尽言。

首先，笔者要向笔者的指导老师——余曆雄师致万分谢意，感谢他生动的教学方式让笔者对古典文学逐渐染上浓厚的兴趣，感谢他让笔者成为他门下的论文学生、感谢他让笔者在拉曼大学中文系三年的学习生涯划上完美的句点。在撰写论文的这段期间，即使老师的时间被繁忙的公务、家务挤满，他还是会在百忙中抽空为笔者修改论文，并不厌其烦地为笔者解答疑惑。从选题以至论文的完成，笔者在余老师的引导下得以顺利完成。所以，若无余老师从旁提点、悉心指导及提供许多宝贵的意见的话，笔者是无法以此形式来完成本论文。然学生资质愚笨，恐怕会让老师有失所望。

再者，笔者也要感谢父母及我外婆在这段期间所给予的鼓励及支持。他们的支持绝对是让笔者可以坚持到这一刻的最大动力。在大学三年的这期间，他们一直都想让笔者能在一个没有压力的环境底下学习，让笔者深深体会到读书的最终目标是学习知识，而不只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而且若无父母辛劳工作，笔者是无法如愿完成大学学业。所以，在此笔者想向他们说声：“谢谢”。

最后，笔者要感激朋友们这三年来的陪伴及鼓励。在笔者想要放弃的那一刻，是他们让笔者明白当初坚持是为了要走到最后。大学的生涯里，有他们的陪伴，让笔者觉得非常幸福。此外，在撰写论文的这期间，当笔者需要别人提供意见时，虹彪都会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这让笔者倍感窝心。

#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3
第二节 资料收集与评述	5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范围	7
第二章 自求外任之始末	12
第一节 立场不同，直言不误	14
第二节 明哲保身，远离是非之地	22
第三章 苏轼与钱塘六井	25
第一节 钱塘六井之由来	26
第二节 苏轼治六井	30
第四章 苏轼之西湖情结	35
第一节 情景交融——西湖之美态呈现	37
第二节 寄情于景——心情、遭遇之表态	45
结语	53

参考书目

一、古人典籍·····	56
二、今人论著·····	58
三、期刊论文·····	60
四、硕士论文·····	60
附录(一): 苏轼通判杭州作品编年表(熙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至熙宁七年九月下旬)·····	61

## 第一章 绪论

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根据王水照《苏轼论稿》中〈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的记载，苏轼除了嘉祐、治平间初入仕途时期外，他曾两次在朝任职（熙宁初、元祐初）、两次在外地做官（熙宁、元丰在杭、密、徐、湖；元祐、绍圣在杭、颍、扬、定）、两次被贬（黄州、惠儋），就其主要经历而言，正好经历两次“在朝——外任——贬居”的过程。（王水照，1994：5）

熙宁时期（1068-1077），王安石厉行变法，朝廷全面推行新法，但基于新法在实行的期间不便于民，故苏轼于熙宁二年（1069）十二月及熙宁三年（1070）二月前后两次上“万言书”给神宗皇帝，全面驳斥新法，且列出新法在实行的过程所带来的弊端。然他这一举动却引发了他与王安石之间激烈的争议。当时，由于神宗皇帝强烈要对朝中弊政进行改革，所以，苏轼的反对是徒劳无功的。再加上，当时朝中的宦官从中设计陷害苏轼，所以在此情况之下，苏轼遂自请外任。施宿在《东坡先生年谱》熙宁四年（1071）辛亥中曰：“是年六月，先生乞补外，上批出与知州**差遣，中书不可，拟通判颍州；上又批出改通判杭州。**”（转引自洪本健，1999：234）熙宁四年（1071）六月，苏轼以太常博士直史官通判杭州，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二十八日，苏轼到任杭州。苏轼通判杭州的日子长达三年之久，直至熙宁七年（1074）九月下旬他才从杭州移任至密州。

杭州，是苏轼第一次离开朝廷外任地方官之地，亦是跟他结下缘分最深，并且是他留下不少足迹的地方，而通判杭州则使苏轼迎来其第一轮的外任生涯。虽然，

当时早年外任的他并没有经历过非常大的挫败，而这时期也不是他人生中大起大落的阶段，更不是他人生中政绩最丰盛的时候，但是，这时期的杭州外任却在他生命记忆中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再者，杭州不仅提供了一个让他得以施展其政治才能的舞台，与此同时，也激发起了他人生中的激情，使他的文学才华能够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创作出与当地民情风俗、青山绿水紧紧相扣的作品。在杭州的这段期间，他的文艺活动得到很大的开展，除了到吉祥寺赏牡丹、访有美堂及观潮这些活动之外，游西湖正是他当时主要的活动。而在这些游历的过程之中，山川地灵给予他许多创作上的灵感，故此，在杭州的那段时期，他的文学创作量远比他在朝廷中当官时的文学创作量来得多，名篇佳作亦美不胜收。除此之外，若从其文学作品中看来，读者也可以略见其政治的见解及当时他在政治上的遭遇，而当中也无不透露出他的政绩。所以，在笔者看来，其政治生涯中一个关键地方，看来就是杭州。

根据王水照在<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中所言：“苏轼的作品是他生活和思想的形象反映，他的创作道路不能不制约于生活道路的发展变化”（王水照，1994：5）所以，在了解苏轼在杭州的际遇及其文学创作之前，笔者认为必须先对其外任的过程有个概念性的了解，这样才能较为全面地将当时苏轼所经历过的及所做过的事一一道出。是故，笔者将会在本论文的第二章中先交代清楚苏轼自求外任的前因后果。在论述他自求外任的过程中，笔者不仅仅只会以苏轼对新法的看法作为切入点，还会从当时朝廷的各种情况来进一步论述。继而，在第三及第四章中，笔者也将以可突显苏轼杭州际遇及文学的杭州特点——钱塘六井及杭州西湖作为这两章的两大主题。

再者，笔者将从苏轼当时主要的作品中找出有关于这两大地方的描写，并与他当时的杭州事迹进行结合论述。

##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苏轼是宋代的文学大家，他在散文、诗、词、赋等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王水照在《苏轼研究》的自序中说道：“苏轼是一位复杂而难以评论的作家，在他身上存在着不少研究难点，同时也往往成为争论的热点和焦点。”（王水照，1999：2）虽然苏轼的思想复杂难懂，但是，正因在苏轼身上存在着许多可论之点，所以，历来以苏轼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学者为数众多。在这些学者当中，他们大多数都是以苏轼在密州、黄州、惠州时期为研究题材，而对于苏轼杭州时期的题材就未曾深入研究之。再者，即使他们有对苏轼杭州的题材进行研究，他们都是单方面地对苏轼在杭州的治水政绩抑或者苏轼在杭州时期的文学创作来进行论述，而少全面性地从他的政绩及文学两方面融合论述，故此，这就无法同时看出苏轼在这两方面的成就。

在沈松勤著的《北宋文人与党政》中有如此写道：“政治与文学不可能一刀两断，而有其错综复杂的关系。文学是心灵的创作，而每一个创造的心灵都不可能脱离具体的渗透着政治影响的时空。尤其是处于政治漩涡或遭受到牵连的文人，其文学创作不能不受政治所投影于心灵的支配和影响。”（沈松勤，2001：283）从而可见，同时身为文人及政治家的苏轼，他的文学创作与其政治生涯是须相提而论的，二者是不可以被分开的，所以，他所写的一切都必然是与其政治上的遭遇息息相关。假如在论述中脱离了苏轼政治的这一部分，而仅透过他的作品来了解苏轼这个人，那么，我们是无

法将苏轼当时的创作心态全面地表现出来。若无法了解苏轼当时创作的心情，那么，就无法将作品中所涵盖的意义挖掘出来。故此，这是导致笔者撰写这份论文的最大动机之一。

在本论文中，基于笔者将讨论苏轼通判杭州的际遇及他的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所以，本论文将透过这两方面的相互融合来进行论述。透过这两方面的融合叙述，不仅可以让读者透过苏轼的作品中看见其在杭州的政治成就，同时间也可以让读者从其政治遭遇来看出其在杭时的文学创作取向。故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不仅仅是在政治场上的苏轼，同时在杭州时文学创作辉煌的苏轼也囊括其中。

再者，笔者将在苏轼阶段性的研究范围内，选择杭州作为本论文的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是，通判杭州是属于他两大循环中的第一大循环的外任生涯，是故，在他的整体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另外，虽然第一次自求外任使苏轼面对了不顺畅的政治生涯，然而，这却让他从中获得经验及借鉴，以此扩大他的政治视野及社会阅历，并且，从中获得了应对日后坎坷政治生涯的更好的方法。所以，笔者认为，只要掌握了杭州这个重要的切入点，那么对于前期及后期的苏轼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因此，如果要对苏轼的其他方面进行研究的话，一切就会变得更为明确。

此外，苏轼历来有“**奋厉有当世志**”（苏辙，1990：1119）的精神，这当中有明显体现在他仕途的前期，而通判杭州以及他在杭州的作为可以相当明确地展示出他“**奋厉有当世志**”（苏辙，1990：1119）的精神，同时，在仕途后期的他也延续着这种精神。故此，若要继续进行苏轼其他方面的研究，笔者相信，苏轼通判杭州

的这一部分是绝对不能被忽略掉，且具深厚的研究价值。于是，这就成了笔者撰写这份论文的最大动机之二。

在此，笔者列举出了两个撰写本论文的动机之后，在以下的行文中，笔者将秉持着这两大动机来对本论文进行相关的论述。

## 第二节 资料收集与评述

“苏学”历久不衰，历来苏轼各方面的研究都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课题，而为苏轼写评传、编年谱、写传记的学者也为数不少。所以，向来有许多出版社出版有关苏轼各方面研究的书籍。如文学集的书籍就有《苏轼诗集》、《苏轼文集》、《苏轼词集》及《苏轼全集》；年谱类的就有《苏轼年谱》、《三苏年谱》；评传研究类的就有王水照和朱刚的《苏轼评传》、曾枣庄的《苏轼评传》、王水照的《苏轼》、王水照的《苏轼研究》、曾枣庄的《苏轼研究史》及王水照和崔铭撰的《苏轼传：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注评类的书籍就有《苏轼全集校注》、《苏轼诗集合注》、《苏轼词编年校注》及曾枣庄的《苏文汇评》等等。有了如此丰厚书籍的帮助之下，将使本论文的内容更为扎实。于是，笔者将对这些书籍中的资料进行筛选，且从中选取最为合适的资料，辅佐笔者进行论述。

在本论文中，笔者是对苏轼通判杭州的事迹及文学创作进行研究，所以，首先须对其外任杭州之背景有具体宏观的了解。继而，苏轼之所以会选择走上外任这条路，王安石变法无疑在这当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因此，在撰写本论文之际，笔

者认为对变法提出的背景及实行的过程须有一定了解，于是，有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资料，笔者将会引用《宋史》、《宋史纪事本末》等古籍文献中对这场改革变法的记载进行论述。

再来，对于苏轼自求外任的原因，笔者认为可归因于：一、他不能苟同王安石变法下所实行的种种措施；二、他企图避开是非，保全自身。所以，在论及苏轼对于王安石变法所提出的种种意见以及批评时，笔者将以《苏轼文集》中的《上神宗皇帝书》及《再上皇帝书》这两篇作品作为主要的论述对象，从中，笔者也会引用《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纪事本末》及苏辙为其兄所作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相关的资料来加强本论文的论述。除此之外，笔者也会从苏轼的其他作品如《议学校贡举书》、《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策畧》及《拟进士对御试策》中选取其对青苗法及任人的论述来作为辅助论证。再者，对于苏轼外任的其他原因，笔者将以《宋史纪事本末》、《三苏年谱》中的资料及苏轼在他《杭州召还乞郡状》中言及的原因来进行叙述。此外，王水照、朱刚所著的《苏轼评传》亦是本论文参考的资料之一。

苏轼在杭州的作品，尤其为钱塘六井及杭州西湖最为重要。是故，在本论文的第三章中，笔者将以苏轼在杭州以钱塘六井为题的《钱塘六井记》来进行论述，并且兼顾其他在《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西湖游览志》、《西湖志纂》及《西湖佳话》、《咸淳临安志》中有关钱塘六井的叙述及历代修浚六井的历史资料以加强本论文的论述。而在第四章中，笔者则会以苏轼当时在杭州的主要的西湖作品如：《饮湖上初晴后雨》、《夜泛西湖五绝》、《湖上夜归》、《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

湖三首》、《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及《菩萨蛮·秋雨湖上萧萧雨》来进行论述。除此之外，笔者也将引用《西湖游览志》、《西湖诗》、《说杭州》、《西村十记》及《说苏轼的西湖诗》中有关杭州西湖的论述来加强此章节的论述。另外，对本论文第三及第四章有帮助及相关的论文，如梁惠兰撰的硕士论文《苏轼治水及相关作品考论》、宋仁正的硕士论文《宋代的西湖与杭州》及李立明的期刊论文〈苏轼与陈襄之情谊研究〉，都是笔者用来作为本论文参照的文献资料。

最后，本论文所引用的苏轼诗词文，皆出自于以《苏轼文集》、《苏轼诗集》及《苏轼词编年校注》。另外，笔者也将会以《三苏年谱》里作品的编年及时代的事迹来作为辅助的资料。于此同时，《苏轼全集校注》、《苏文汇评》、《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苏轼诗集合注》里的注疏，让笔者更易懂得苏轼诗词文所要阐述的哲理，故此，这些文献都对本论文的论述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在本论文的论述之际，笔者会酌量选取一些较为合适的注疏放入其中，希望透过这种方式可以加强本文的论述。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with 范围

在《送襄阳从事李友谅归钱塘》中，苏轼有提到，“居杭积五岁，自意本杭人”，（苏轼，1999：1961）苏轼因王安石变法而前后两次自求外任到杭。第一次，是熙宁期间以通判身份到杭，而第二次，则是元祐时期以太守身份到杭。由于，后

期出守杭州距离他第一次的外任时间较远，所以，在本论文中，笔者只选取他第一次到杭州的事迹及文学作品来进行研究。在此后的研究，还可尝试以“苏轼元祐时期的自求外任”或“苏轼元祐时期的总体论述”进行研究，这有助于宏观把握他两次的杭州外任。

在本论文中，笔者将从两个方向来进行撰写。首先，笔者在此将列出一个苏轼通判杭州时期的主要作品览表，继而将作品进行编年，以便于辨识。由于苏轼的作品为数不少，故此，笔者只会从《三苏年谱》、《苏轼词编年校注》中选取一些主要的作品来列入此表中。通过览表的预览，不仅方便笔者选取与主题相关作品，而且从中也可以读者看出苏轼在杭州时期不仅在政治上为人民有所贡献，而且他在文学创作上也并不会因为外任到杭州而有受到任何负面的影响。反之，苏轼在朝廷为官时的诗歌创作量远远不及他在杭州通判时期的诗歌创作量。他在杭州山川地灵人文的影响下，创作出许多以当地特色为主题的文学作品。而在这些作品中，笔者只会从中选取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来进行论述。

再者，笔者将透过文史结合的方式来对本论文进行论述。因为，要对古代的文人及其作品进行研究，笔者认为文史结合是颇为重要的一环，是不可忽略的研究方法之一。如吴在庆在其〈浅谈古代文学教学的文史结合的方法〉中有这么说道：

**文史结合解读古代文学作品，使我们对作品的讲解更贴近历史真实，**

**得其要旨真解，而且也因此使讲解更加具体扎实，更富有历史的、文**

**学的深厚度。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除了受历史大氛围的影响之外，不少作**

品是作家有感于具体的历史事件、社会现实或自己的人生遭遇，即为真实的感遇所能动而创作的。因此，不少作品可以找到它所产生的背景事件，而这些背景事件有不少仍保存在历史等典籍中。解读它们，如果不了解其背景事件，那么讲解就往往有失真切全面，或甚至难得真解，这样的讲解也就显得空泛而苍白无力。（吴在庆，1997：35）

故此，以文史结合的方式来对苏轼的作品进行解读就可对其作品的背景、产生的时间、相关的历史状况、时代背景及其人生的遭遇有更深入一层地了解，而不只是单单只从其文学作品本身着眼。如此的论述会使本论文更显其张力，内容更为扎实，而苏轼的真实一面也会呈现在读者面前。除此之外，当时苏轼外任之背景与其通判杭州时期的人生遭遇也可通过他的文学创作生动地表现出来。由此可见，如果仅仅只对苏轼的作品进行分析，那只是纯粹论述其作品的大意，是无法使文史到达结合的，所以，在进行论述的时候，笔者将会结合其当时的处境、时间及其他一些相关之事来综合论述。

另外，苏轼在杭州时期不仅做了许多有益人民的事情，同时他的文艺活动得到了很大的开展，使他获得许多额外的灵感，从而写下与当地相关的许多优秀作品。然而，尤以塘六井及杭州西湖为内容的作品最为有特色，并且能使苏轼在杭州的作品创作的主题及政治的遭遇及取向更加明确可见，是此，笔者将引用与钱塘六井及杭州西湖这两个主题相关的作品进行论述。

首先，在钱塘六井这个主题的内容论述方面，笔者将会较着重于苏轼在其政绩方面的表现。而在杭州西湖这主题上，笔者将会较着重于苏轼在其文学上的表现。虽然，在两个主题里，笔者在论述当中会以苏轼其中一方面的表现为主，但苏轼的另一方面表现，笔者仍然会予以论述。另外，在选取作品方面，笔者为了可更全面地进行论述，所以，无论是散文、诗歌或者词，只要能展现这两个主题的作品，笔者都会引用来加强本论文的论述。除此之外，在论述中，笔者将以其他有治过六井的官员来衬托苏轼，希望以此来突显出苏轼在杭州时期治六井的功劳是高于其他人的。

总的来说，目前，笔者只会以此模式来对本论文进行撰写。虽然，本论文的研究成果无可避免将面临一定的难度及局限，但是，笔者还是会在校方所限定的时间内将本论文完成。而本论文的首要难度就是要同时兼顾苏轼通判杭州的际遇及其文学创作，然而，在老师的引导下，笔者所面对的难题相对来说解决了不少。再者，大多与本论文相关的许多资料都需付钱才能下载，抑或者有些资料是不被允许下载的，所以，在某些资料缺乏之下，这难免会使到笔者在撰写论文之际受到影响。再来，在参考书籍的数量有限之下，笔者也只能尽我所能，把各种相关的书籍及收集到的参考文献都列入在本论文的参考资料中，希望可以以此来补充本论文的不足之处。

由于本论文只是苏轼的阶段性的研究，所以，如果日后要再进一步地进行研究，笔者认为以此论文的论述方向可以扩展至苏轼与其他人交往的部分、苏轼作品中的西湖主题研究及苏轼前后两次的杭州外任等等。从而可见，苏轼虽然已经被诸多学

者进行过无数次的研究，但是，苏轼这号人物终究还是有其研究价值存在，而且在他生命中其实还存在着许多未被发掘一面。

## 第二章 自求外任之始末

自宋仁宗朝（1063），社会经济、文化继续地走向繁荣，但政治、军事上显露的弊端却越来越令人困扰，其中国家财政上的入不敷出与武备废弛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一语以概括之，就是“积贫积弱”。按照王安石的说法，这些问题已把宋朝带到了崩溃的边缘，嘉祐五年（1060），他上“万言书”给宋仁宗说明当时的形势：（王水照、朱刚，2006：22）

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

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惴惴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

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王安石，2005：21）

从上就可得知，当时的北宋朝廷面对的不仅仅是连年的财政赤字，而且在军事的势力上也难以抗衡夷狄，故此，导致财政和风俗都日益渐败。朝廷所面对的这两个问题都致使有方之士感到担忧恐慌，而王安石则认为当时的时政会到达那种地步的原因是因为缺乏了一套完整的法度来管理，故他认为“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所急也。”（陈邦瞻，1977：327）。

治平四年（1067），英宗病逝，神宗继位。神宗年富力强，颇想有所作为，认为天下之弊事不可不革，理财为当务之急，（曾枣庄，2006：60）求治心切，意要改变当时积贫积弱的政治局面。于是，他在位后便立即召见王安石来商讨变法的方案。“二年春二月庚子，以王安石参知政事。”（陈邦瞻，1977：326）而“甲子，议行新法，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陈升之、王安

石领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颁行天下。”（陈邦瞻，1977：327）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王安石变法”。

新法施行的初阶段，朝廷中有许多老臣子及新入仕途之士如司马光、吕公著、赵抃、富弼、范纯仁、傅尧俞、曾巩等人都因新法带来的不便而极言反对新法。在这班人当中，苏轼算是反对最为激烈的年轻一辈的官员。最初，苏轼是没有强烈表示反对的，但因新法施行一段时间后出现了许多弊端，使到人民未受其利先受其害，所以，他从实际情况作出考虑，“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书对策，直陈其失。”（李焘，2004：5340）在熙宁年间两次上万言书给神宗皇帝，全面对新法作出批评，并从中提出了自己种种的看法与见解。然而，在宋神宗全面支持新法之际，他的反对是徒劳无功的。于是，在政见不合与得不到神宗皇帝的支持的情况之下，苏轼在熙宁三年（1070年）便主动上疏请求外任。

在苏轼乞求外任的原因中，笔者认为除了意见不合的原因之外，其实还包括了他想要远离朝廷这是非之地，保全自我的想法。所以在下文中，笔者将会对苏轼自求外任的原因再加以地探讨之。

清人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的〈宋史风俗〉曰：“当时论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根本之言，人主所宜独观而三复也。”（顾炎武，2007：728）而在《古文渊鉴》卷四九中所引用的王熙评论中也有说道：“新法不便于民，当时言者甚众。其间指陈利害，质直剴切，无踰此书。”（圣祖御选、徐乾学等奉敕编注，2003：389）基于在苏轼的《上神宗皇帝书》及《再上皇帝书》这两篇作品中涵盖了苏轼当时的

政治主张，当中也指出新法许多弊端及不便之处，故此，在第一节中，笔者首先会以他在《上神宗皇帝书》及《再上皇帝书》中提出他不能苟合新法的看法来进行论述。而在第二节中，笔者继而会带出其不安于朝廷，并且对他想要离开朝廷、明哲保身的原因进行探讨。

### 第一节 立场不同，直言不误

年轻的神宗皇帝力图改革当时朝中的弊政，故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继而创设了“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新机构，并议行青苗、均输、市易、免役、农田水利等新法。新法的主要内容为财政与整军，其目的是为了达到富国强兵，抑制“兼并”，堵塞“利孔”，将商品的利润收归朝廷的最终效果。（张志烈等注，2010：4）但是，三司条例的创建之后，“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苏轼，1986：730），于是，苏轼向神宗皇帝提出“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置三司条例司”（苏轼，1986：731）的要求。因为，对于苏轼来说，朝廷不需特意设立一个财政机构来解决财政困难，因为他觉得民生、兵制、吏治比这一切来得更为重要。

除此之外，苏轼同时也指出了皇上“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同道”（苏轼，1986：749），严厉地攻击“今日之政”，谓“小用则小政，大用则大政，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苏轼，1986：749）。于是，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和《再上皇帝书》中对变法所进行的措施提出了许多看法及有系统化地阐明新法所带来的弊端，并且说出了新法不可取之处。

一开始，苏轼便在《上神宗皇帝书》公开批评新法的“不便”之处：“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徒贵就贱，用尽易远。……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后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想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廩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期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陛下以为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苏轼，1986：736）他认为新法施行的期间虽然有得到一些成果，但是往往亏损的比收获的来得多，而他们往往只把新法所好的一面呈现在众人眼前，而不好的一面往往隐藏于人后。所以，在这里他就提出“节用以廉取”，反对“取利于民”的主张（李道英，2005年：362）。

再来，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苏轼指出君主之安危系于人心，国家之兴衰在于风俗，朝廷之治乱赖于纪纲，故此他奉劝神宗皇帝必需要“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苏轼，1986：729），并且能依据“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苏轼，1986：729）这三个首要条件来对新法进行改革。

在苏轼所畅言的三大纲之中，“尤以结人心为主，以安石新法皆拂人心之事也。故此条畅言之。”（沈德潜选评、于石校注，1998：562）苏轼强调察乎民心，不赞同过于强化皇权。故他首要就向神宗皇帝提出要实行“结人心”之策。因为，他深知，如果“民心”背离的话，那么君主的统治就不可能维持长久，故身为人君者“欲得天下，必先安民心、获民心”。由此可见，“民心”对于一个国家的长久

治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说“民心”是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盛衰。在文中，苏轼为了加强他的说服力，于是他便举了三个例子来进行论证。如在秦国时期，商鞅进行变法，他不顾人言，后来国家虽然变得富强，但是人民只知道利，社会上只见刑法，那么，这时君主即使得到了天下也不会维持恒久；宋襄公虽然有行仁义，但是他是与敌国讲仁义，不听谋臣劝谏，故失去“民心”，而“民心”一旦失去，国家也不能维持长久；田常虽然不义，但是他却因得“民心”而使国家富强起来。苏轼特以商鞅、宋襄公来说明他们所行之政策非王道仁义执政，故此遭致民怨四起。苏轼以此来带出，王安石进行变法时的一意孤行已导致民怨四起，他已失去“民心”，所以他希望神宗能够罢除新法，以换得天下安定。

再者，苏轼非常注重社会的风气及道德，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写道：

**“愿陛下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苏轼，1986：737）。在苏轼看来，“国家之所以存亡”是在于“道德之浅深”、“风俗志厚薄”，而不是在乎“强与弱”、“富与贫”，从中他明确带出他反对了王安石富国强兵的主张原因。因为在他看来，一个国家能够长久治安，最主要的就是良好的社会风气，这是统治者首要需注意的事情，而国家是否富强，这还是其次。但是，当时所施行的新法注重的却是要如何达到富国强兵的效果，而忽略了社会的风俗习惯。虽然，苏轼这种观点否定了他过去在对制策时所倡导改革的观点，但是，在王安石的以“生天下之财”为改革唯一目的、以“争利”为社会的唯一价值取向的形式下，苏轼这个社会道德风俗的的论述，无疑具有纠偏治弊的针砭作用，并且对于要如何构建起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张志烈等注，2010：5）。

另外，苏轼反对神宗皇帝“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苏轼，1986：742）操之过急的治国方法，他认为“得入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苏轼，1986：723），治理好国家的关键是在“任人”，故此必需侧重于择吏任人。所以，他认为“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苏轼，1986：232）对于苏轼来说，天下之所以多番出现弊端的原因是因为朝廷用人不当，故此，他对王安石大胆地改变“法制”这行为是不认同的，因为，对他来说法制可以不变。但是，对于王安石来说，他已察觉到当时的局势已达到了“如药不瞑眩，厥疾弗瘳”（王安石，2005：65）的地步，所以非讲求“法度”不可。清人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的〈宋史风俗〉曰：“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务，而宿望旧人，议论不协。”（顾炎武，2007：726）于是，当时他退故许许多年老的大臣，而起用新进少年，但是这却导致“招来新近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成，浇风已成。”（苏轼，1986：738）王安石他以政见合己者择吏选官，而对其品德及才能没有进行全面的考察，因而其擢用的官吏多为新进险刻之徒。这些人都急于求进、不择手段，并且假改革以济其私、党同伐异，从而带坏了一代士风。（张惠民、张进，2004：78）于是最终导致“朴拙之人愈少，而巧佞之士益多”。（苏轼，1986：739）整个朝廷都是一些以迎合别人之见、虚伪、巧言谄媚之徒。

此外，那时候的朝廷“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苏轼，1986：732）对于持有异言者是给予排斥的，这使到不同政见者失去了自由发言的权利，故此，就算朝廷“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难。”（苏轼，1986：733）但没有人敢于发出反对的

声音，所以，当时的政策即使有何不妥都无人愿意据实禀告皇帝。因此，苏轼想借此次的进谏来让神宗皇帝看到新法不好的一面。

为存纲纪（治理国家之道），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也道出了设立“台谏”一职的重要性。“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元脱脱等撰，1977：11963），台谏自古具有“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苏轼，1986：740）之作用，而且“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义，公义所兴，台谏亦兴之，公义所击，台谏亦击之。”（苏轼，1986：740）但是，在当时，由于“新法”不断地遭受台谏的攻击，施政者只好不断地撤换台谏官员（王水照、朱刚，2006：359）。借此，苏轼希望劝道神宗皇帝能慎重考虑台谏存在的重要性，并且希望神宗皇帝可将这些奸佞小人驱逐出朝廷。

由上可见，“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苏轼，1986：729）无疑是用于纠正新法弊端的重要建议。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苏轼透过这三方面来对“新法”所带来的弊端进行的论述说理透辟，从而带出新法的负面效果。

次年，苏轼上《再上神宗皇帝书》，论新法之不可行：“青苗、助役之法行，则农不安，均输之令出，则商贾不行，而民始忧矣。”（苏轼，1986：749）青苗、助役及均输等法原是要解决宋王朝所面对的经济问题，但是这些措施却只“言利”，并不是以人民为主，而是以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再者，在实行的过程之中，新法的措施出现了许多流弊，而他们为求成效，不免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所以，苏轼才会极言反对新法。而王安石的学生陆佃也曾对王安石：“法（新政）非不善，但推行

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陈邦瞻，1977：344）可见当时新法不仅无法达到预期中的效果，而且还打扰民生，使到民生困顿。

“初散青苗，本为利民。”（苏轼，1986：783）青苗法本来是政府于青黄不接之际，贷款给人民，秋收之后，并收取二分利息的一种政治措施。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有些地方是以发放实物，折价计钱来进行的，但是，这些地方的折价标准却比市价来得更加高，而且，在归还时，又强令纳现钱，再加上这时正是谷登之际、谷价下跌之时，所以，农民在此法施行之际蒙受双重的损失。（曾征平，2001：56-57）故苏轼才会说：“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苏轼，1986：303）。另外，农民因无恒产，在农村毫无地位，政府的贷款，往往不能惠及于他们，即使有些得到贷款，因家境寒微，生产不易，又多收二分利息（有时贪官作梗，还在二分以上）这种种原因，以致秋后他们实在无力偿还。所以，这样做的结果，使老百姓的生活更为拮据，更为无助，从而也加剧了他们的痛苦。（曾征平，2001：56-57）而且关于发放青苗钱的措施，“提举官速要见功，务求多散，讽胁州县，废格诏书，名为情愿，其实抑配。”（苏轼，1986：783）朝廷不问农民需要与否，有无偿还能力，以至采用强贷的方法，以多放为政绩；而农民得到了青苗钱，都未必可用于青黄不接的难关或增加农业投入。（张惠民、张进，2004：78）从而可见，青苗法在实施的过程中的确出现了严重的弊端，但是朝廷显而只取其利而忽略其害，如此一来，此青苗法不仅没有改善人民的生活素质，反之，还让人民的生活更为惨困。

与此同时，朝廷也将差役法改为免役法，使原先没有差役负担的女户、未成年丁户等也变得有负担。原本按免役法的内容是以钱代役，但是，有一些地方因户少民贫，免役钱出至五等户；有的地方，官吏“务欲敷配钱数”，在评定门户时给人不适当地升等升级，“下户入中，中户入上”，从而加重了中下户的负担。有些地方甚至还发生强迫农民拆屋伐木以纳役钱的事情。也有地方每年应用募役费不多而从民间敛取了近四倍的役钱。（曾征平，2001：57）但是，后来苏轼认识到，乡户出钱雇役，与农民出粟米养兵，是同样的社会分工的道理，是合理可行的，所以，他就否定了之前的看法。（王水照、朱刚，2006：356）由此可见，对于新法中合理可行的措施，苏轼并不会坚持己见，而是会站在客观的角度出发，对新法所行之措施进行审核。

另外，在均输法中，朝廷规定凡采买、税敛、上供的物品，均可“徙贵就贱，用近易远”（苏轼，1986：736）；凡需供办的物品，可以“从便变易蓄买”。这条措施对限制大商贾，增加朝廷收入是有带来好处的。（曾枣庄，2006：64）但是，在均输法中“与商贾争利”这一点苏轼是反对的。苏轼指出，商品交易需用灵活手段，才能获得利息，现在“设官置吏”来经商，“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只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他说用官僚机构经商，怕会亏本。纵使略有所获，却同时也损失了原来在自由买卖中所得的商税。而且，自由买卖若被抑制，既无利于国，也招怨于民。（王水照、朱刚，2006：358）这样做不仅不能增加朝廷的收入，反而会加重朝廷的负担。

由上可得，苏轼和司马光等人是不能挂上同等号的，他反对王安石的主要原因

是其“与民争利”之一点，而他担忧的是青苗等法所带来的流弊会危害及普通农民。

但是，对于新法中如限制皇族特权、修完器械、阅习旗鼓等项缩减皇族官僚特权这些加强国防战备的措施他是表示肯定。（张志烈等注，2010：5-6）

在政治上，新法有其存在的积极意义，但与此同时，新法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流弊，所以苏轼以其独立的政治见解，驳斥新法不可行之余，他也针砭弊政，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弊政的言论。在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有提及到：“公与介甫议论素异”（苏辙，1990：1118），由于他和王安石的改革思路有着重大的分歧，再加上神宗力图改革之心坚定，故此，他在当时没有获得宋神宗及王安石的认同。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其中苏轼则写到：“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迟钝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鞶丞。”（苏轼，1999：314）这说明了苏轼之所以自求外任的原因是因为“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苏轼，2001：285），而且他“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苏轼，2001：285）“言己才力不能胜任，意亦是讥新法事烦，难了办也。”（孔凡礼，2004：626）苏轼眼见新法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但他所提出的看法无法被神宗皇帝接纳，无法改善新法所带给人民的不便，故在政治理念难以实践的情况底下，他只好呈上引罪自责的辞呈，自求外任。这就是促使他决定自求外任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苏轼与王安石之间也因为政治见解的不同而导致彼此之间关系闹得非常僵硬。而他直言敢谏，直陈其失，对于新法中不可行的条例始终坚持己见、不苟合及不放弃自己的主张的性格也致使他遭受排挤，无法容于朝廷，故此，这就

是他自求外任的原因之一。在下一章节中，笔者将会对苏轼自求外任的第二个原因再进一步地进行论述。

## 第二节 明哲保身，远离是非之地

苏轼论事无讳，直言反对新法（张惠民、张进，2004：116），在两篇上神宗皇帝书中全面提出种种看法来非议新法，所以他“论事愈力，介甫愈恨”（苏辙，1990：1119）。除此之外，他与反对新法的元老重臣关系密切，更让支持变法的一派想要将他驱逐出朝廷。于是，在此情况之下，苏轼在朝廷是遭受排挤打击的。

另外，对于苏轼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评新法之举，不仅让神宗皇帝心中深感不满，从而也让朝廷中的宦官有机可乘。如在《三苏年谱》中有论及苏轼遭受谢景温诬奏一事：“八月五日，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诬奏苏轼向丁父忧归蜀，往还多乘舟，载物货，卖私盐等事，盖缘范镇谏苏轼而发。”（孔凡礼，2004：569）而且在《续资治通鉴长编》熙宁三年（1070）八月癸亥条对此亦有详细的记载：“苏轼居丧服除往复贾贩，及令天章阁待制李师中供析照验见轼冒差借兵卒事实以闻，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劾奏故也。景温与王安石联姻，安石实使之。穷治，卒无所得。”（李焘，2004：5200）之后，苏轼也在其《杭州召还乞郡状》中辩白事实：“安石大怒，其党无不切齿，争欲倾臣。御史知杂谢景温，首出死力，弹奏臣丁忧归乡日，舟中曾贩私盐。遂下诸路体量追捕当时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证，但以实无其事，故锻炼不成而止”。（苏轼，1986：912）当时，王安石对于苏轼反对新法之举大大不悦，而其党员们也对苏轼深感不满。在众多党员之中，王安石的姻亲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就首起诬奏弹劾苏

轼，说他在扶苏洵的灵柩回船及赴京的时候，乘舟载货物、卖私盐等事，而且沿途冒名义向地方官差借兵卒。当时，神宗就下令查实真相，而谢景温等人则是全力去追捕当时为苏轼掌船的篙手，同时也大量搜罗证据，势必要将苏轼入罪。但最终幸而寻无证据，无法将苏轼入罪。

从上可见，对于苏轼的不愿“附会”，王安石等人当时是何等的恨之入骨，而将莫须有的罪名加罪于他的身上。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苏轼就叙及了他是“缘此惧祸乞出”（苏轼，1986：912）。在遭遇谢景温诬奏一事之后，苏轼深深感到朝廷的人心险恶一面，并且认为朝廷是不宜他久留之地，所以，他不想在朝廷这个是非之地久留。他希望能借着外任能够远离朝廷中新旧党争的政治斗争漩涡，从而也可以避开那些居心叵测之人，离开是非之地，保全自我。再者，他实无其过，故不屑也不想与诬告其者辩论，于是，他“未尝以一言自辩，乞外任避之。”（苏轼，1990：1119）在赴杭之际，他曾经有说过：“愈远乡里，曷胜依黯”（苏轼，1986：1887），从而可见，他离开朝廷非他所愿，而是为情势所迫。

除此之外，谢景温弹劾一事虽然事后查明事实是与苏轼无关，但是此事已导致宋神宗对于苏轼产生疑虑，对他不再信任。宋神宗曾与司马光说过：“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李焘，2004：5201-5202）身为人臣者，秉持着政治理想，无疑是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得到君主的赏识重用。但是，如果想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那首先就先要得到君主的信任，因为只有得到信任之后，才会被君主重用。然而，历经此次的弹劾事件之后，宋神宗认为苏轼不值得被重用，并且对他的信任度日益减退，不再纳取其意见，所以，即使苏轼还留在朝廷也难有所作为。于是，经过慎

重的考量之后，他才会自动提出外任之请求，希望离开朝廷之后能在别处有所作为，以实践他的政治理想。由此可见，苏轼这次的外任确实是一个较为明智的选择。

### 第三章 苏轼与钱塘六井

苏轼出身于世贤之家，因受其父母的影响，故自小就具有“**奋厉有当世志**”（苏辙，1990：1119）的淑世精神，并在《次韵柳子玉过陈绝粮二首》其中自称“**早岁变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苏轼，1999：275）而关心民生就是苏轼济世抱负的体现。所以，苏轼无论身处朝廷还是在外当官，他都会以人民为优先。

在通判杭州时期，苏轼并没有消极地对待其宦官生活，反之，他还为民谋求福利。作为杭州的地方官，他尽心职守，用世之意都表现于关注百姓的生存及为百姓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上。在为百姓做事之际，他亦乐在其中，从中体现出他积极乐观的处世态度。正如他自己所说：“**政虽无术，心则在民**”（苏轼，1986：1921），苏轼倅杭时虽然不用再面对王安石，但那时王安石还在朝廷中为相，变法还是持续在进行中，而且还在实际推行过程中陆续出现了种种问题及弊端。在无法阻止新法进行的情况之下，苏轼唯一能做的就是减轻新法为人民所带来的不便及痛苦，并且在他能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心尽力地为人民办事，尽其身为地方官的责任。例如，苏轼在《钱塘六井记》中就记载了他通判杭州之际与太守陈襄一同疏浚钱塘六井的政绩，当中，无不流露出他那关心民瘼之情感。

在以下的两小节中，笔者首先会在第一小节中大略讲述钱塘六井的由来及历来官员对钱塘六井的整治疏浚的过程。而第二小节中，笔者将以苏轼的《钱塘六井记》来带出苏轼与太守陈襄对钱塘六井的疏浚的整个过程，希望以此展示出苏轼修浚钱塘六井的政绩是在其他人之上。

## 第一节 钱塘六井之由来

杭州，在宋代是一个既存有自然风光而又不失都市繁荣之景的地方。柳永在其《望海潮》中，给予杭州很大的评价：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柳永，2005：79）

杭州亦被称之为“钱塘”。在此，柳永明确指出杭州是位于东南、三吴一带的重要都市，从而将杭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及其历史的悠久一同展现在读者眼前。在

“**烟柳画桥**”（柳永，2005：79）及“**风帘翠幕**”（柳永，2005：79）二句中，柳永不仅刻画出当地风景之优雅，而且也刻画出当地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画面。而在“**参差十万人家**”（柳永，2005：79）这一句中，柳永则将杭州富庶景观的一面展现在读者眼前。从杭州各方面的优势看来，当时杭州确实为一个适合长久居住之所。然而，陈襄却在《古灵集》卷二十五承奉郎守秘书省著作郎太常寺叶祖洽撰的《先生行状》中曰：“**杭虽号水乡，而其地斥鹵，可是之水常不继。**”（陈襄，2003：708）在这万般美好的地方，人民却在水源上面临水源不足的这一大问题。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杭濒海，水泉咸苦。**”（田汝成，2004：240）所导致而成的。

杭州本来是钱塘海潮水冲击所形成的一块陆地，但由于长期受到钱塘咸潮的侵蚀，淤积成的陆地因碱性太重，所以，水质苦涩，难以吞咽，不堪饮用。宋仁正在其硕士论文《宋代的西湖与杭州》中有写到：“**在唐宋之际，杭州城区仍不似今日一**

般远离海洋，故再大潮汕之时，海潮甚至会将整个杭州平原城区淹没。在此情形下，杭州周围地下水水质趋于咸苦。”（宋仁正，2004：15）除此之外，苏轼的《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中也对此有所论述：“杭之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咸苦，居民零落。”

（苏轼，1986：864）因钱塘江所流出来的水，皆流入江中，东流于海，导致其当时的水质苦涩，人民稀疏，久为聚落。（梁惠兰，2008：75）此在苏轼的《钱塘六井记》中更加可得到证实：“潮水避钱塘而东击西陵，所从来远矣。沮洳斥鹵，化为桑麻之区，而久乃为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陆，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恶，惟负山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广。”（苏轼，1986：379）由此可见，杭州的水质苦涩不能饮用，故此，当地的人民需要爬山掘井才可获得水源，但是，此行非常费时费力，所以水源最终还是供不应求，人民的水源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的好办法。由于水源为人民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质，所以此问题非解决不可。

自唐代始有治水之举，根据《新唐书·李泌传》的记载，在太宗大历年间（766-779），唐朝名宰相李泌因“会澧州缺，袞盛言南方凋瘵，请辍泌治之，乃授澧朗峡练使，徙杭州刺史。”（欧阳修、宋祁，1997：4631）而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则记载到李泌于：“德宗兴元（781-784）时守杭州，始作六井。”（田汝成，2004：161）李泌在担任刺史之际，他细心查出“泉眼”，率民建造六口大井，分布在城区的各处，使人民可以从六井中汲水用于日常生活上。关于李泌所开之“六井”，潜说友在其《咸淳临安志》中有详细的记载：“六井：一曰相国井，在甘泉坊侧。一曰西井，亦名化成井，在安国罗汉寺前，其水口在李相国祠前。一曰方井，俗呼四眼井，在三省激赏酒库西。一曰小方井，俗呼六眼井，在钱塘门内裴府前，其水口在菩提寺前。一曰白龟池，其水不堪饮，止可防虞，水口在五莲堂北。一曰金牛井，废。”

（潜说友，2004：629）而此于苏轼的《钱塘六井记》中亦有记载：“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为相国井，其西为西井，少西而北为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为方井，为白龟池，又北而东至钱塘县治之南为小方井。”（苏轼，1986：379）由此可见，李泌所造之井一共有六口：那就是相国井、西井、方井、小方井、白龟井及金牛井。

李泌在建造六井之后，他就引西湖淡水，供全城饮用，他的政绩在《西湖佳话·白堤政绩》有写道：“李泌来为刺史，留心政事，方察出民之调敝，皆由水泉咸苦之故。因自到西湖之上，亲尝那西湖之水，见其见恬淡可以养生，便思量要引入城中，以救那咸苦之害，却无计决凿，因再三审视，方又察出西湖之水，原有泉眼数十暗行地中，必凿井相通，将湖水引入，令居民食淡，方遂其生。因不惜一时之财，分用民夫。”

（墨浪子，1999：20）再者，《西湖志纂·历代开浚始末》亦述及李泌之政绩：

“唐代宗时，李泌刺杭州，闻钱塘濒海市民，苦江水卤恶，难以安土。始凿六井，开阴宝，引湖水，以资民汲，民甚利之。”（沈德潜辑、沈龙云主编，未注出版年月：142）

杭州居民的饮水，主要来自于井水，而井水可分为山泉水及西湖水这两种；因西湖紧邻杭州城，故西湖淡水遂成为杭州居民饮水的主要来源。而城中以西湖为水源的水井，是以唐李泌所开凿的六井为主。（宋仁正，2004：18）从李泌亲力亲为，亲自审查西湖之水是否适于民饮，并且找出“泉眼”之举，可见他对杭州当地人民所作出的贡献，故《新唐书·李泌传》中以“皆有风绩”（欧阳修、宋祁，1997：4631）来称颂之。李泌凿六井之举造福杭州的人民，使他们不再受咸苦之害，故百姓生聚渐繁且日富；但是，未料李泌去任后，后官又无意于生民疾苦（墨浪子，1999：21）。故此，日积月累，长时间之下，六井因为西湖的淤滞而逐渐减少了井中的水量，导致湮塞的情况出现，使六井久之皆废坏。

接在，于唐穆宗长庆二年（822），著名诗人白居易请求外任，七月奉命任杭州刺史，并在十月到任。根据《旧唐书·白居易传》中的记载，他自求外任的原因如下：“时天子荒棕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七月，除杭州刺史。”（刘昫等撰，2002：4353）在遍访民间时，他得知日前李泌所建之六井因时间长久无整治而早已经湮塞，影响城内的供水，所以，他便急发人丁，更进一步对西湖进行整治，疏浚六井，解决杭州人民的饮水问题及农田的灌溉。（王水照、崔铭，2002：73）在《钱塘湖石记》中，白居易有写道：“其郭中六井，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甚利于人。与湖相通，中有阴窞。往往湮塞，亦宜数察而通理之。”（白居易，2011：1843）他此政绩亦可见于《新唐书·白居易传》：“为杭州刺史，始筑堤捍钱塘湖，钟泄其水，溉田千；复浚李泌六井，民赖其汲。”（欧阳修、宋祁，1997：4303）除此之外，在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中亦有记载：“长庆时，白居易缙邺侯之绩而浚治之，民以为利。”（田汝成，2004：161）从而可见，白居易在担任杭州刺史的期间，对六井进行了修浚的工作，人民也从中获利。然而，不久之后，六井又渐渐地因废置而淤塞，故此，当地人民又再次陷入水源不足的困境中。

继六井之后，于嘉祐时期，有南井提供人民水源。如《西湖佳话》中所云：“嘉祐中，知州事沈遵，作南井以补金牛井之缺，人称沈公井。”（沈德潜辑、沈龙云主编，未注出版年月：144-145）沈遵因“凿井引湖水以便民”（田汝成，2004：430）有功，故劳当地人民将其所作之南井称之为沈公井。对此，苏轼在《钱塘六井》中也予以记载：“太守沈公文通又于六井之南，绝河而东至美俗坊为南井。出涌金门，并湖而北，有水闸三，注以石沟贯城而东者，南井、相国、方井之所从出也。”

（苏轼，1986：379）由上可知，南井之水出于涌金门，并在西湖的北边设置三个水闸，是用来调节水位与控制水流量的，（梁惠兰，2008：93）因而在建设南井之后，得以改善人民的水源问题。然而，“四远取汲，而创始天裂，水常不应。至熙宁中，六井及沈公井，例皆废坏。”（苏轼，1986：901-902）

由上可见，六井虽然得到了李泌及白居易的疏浚整治，然而皆无法治其根本，六井最终还是因无人整治而出现湮塞的情况。但是，民生日用最不可缺为饮水，而且六井又是提供杭州人民汲水之地，如果六井湮塞，人民在饮水、用水方面就会面对严重的问题。再者，沈澆所作的南井虽是修补金牛井之缺，然“南井沟庠而升高，水行地中，率常不应”（苏轼，1986：379），所以，当地人民的水源问题还是得不到一个完善的解决方案。在缺乏水源之下，民生必然困顿，进而就会遭致民怨四起。民心乃是治国之根本，故此，六井之整治是为当务之急。

## 第二节 苏轼治六井

在上一小节中，明显可见的是，唐代的李泌与白居易对六井的整治都出了不少力，但是，六井因长时间废置后，已不能再使用。而且沈澆所建之南井至熙宁中也废坏。于是，当地的人民再次面临水源供应的问题。这情况一直维持到苏轼任杭州通判，对六井益加修浚后，人民所面对的水源问题才相对解决了不少。

苏轼素以“天下之重为己任”，且具经世济民之理想，故他为官勤政爱民，凡是都以民为主，而陈襄则素“平居存心以民间利病为急”（元脱脱等撰，1977：

10421)。所以，熙宁五年（1072年）陈襄移知到杭州，得知六井荒废，无法供应人民用水，于是便立志要与苏轼齐力疏浚钱塘六井。在共事期间，由于二人政治理念相同，故此，他们的政治步伐始终协调一致。

身为“通判”的苏轼，于公，是知府的副手，故要协助太守陈襄处理公务是本职；于私，自己亦想造福百姓，为民兴利，加上两人有很好的情谊，苏轼必然会给予最大的支持与帮助。（梁惠兰，2008：92）所以，在这期间，苏轼积极协助陈襄太守，实地考察唐代李泌所挖掘的六井，并且组织民力对六井进行了浚修的工作，从中就体现出苏轼用心整顿吏治的精神，并施展出其爱民抱负的一面。

首先，他们的修浚工作从最大的相国井开始著手：

“发沟易瓮，完緝罅漏。”（苏轼，1986：379）

他们疏通水道，清除污秽，之后就更换井壁四周破损的石块，重新修补裂缝，堵住漏洞，使渠道畅通。（梁惠兰，2008：95）；过了没多久，“相国之水大至，坎满溢流，南注于河，千艘更载，瞬息百斛。”（苏轼，1986：379）对相国井修补完毕之后，便开始着手整治方井。但是，“以方井为近于浊恶而迁之少西，不能五步。”

（苏轼，1986：379）虽然方井迁徙至不到五步距离之地，然而在这过程中，却意外发现到原来这是古方井的旧地。

继而，为了更好地对相国井进行浚治，他们就先对涌金池加以疏浚：“疏涌金池为上中下，使浣衣浴马不及于上池。而列二闸于门外，其一赴三池而决之河，其一纳之石槛，比竹为五管以出之，并河而东，绝三桥以入于石沟，注于南井。水之所从来高，则

南井常厌水矣。凡为水闸四，皆垣墙扃鏊以护之。”（苏轼，1986：379）补好了罅漏之处，完善了输水的竹筒之后，他们又修葺四座闸门，引入西湖淡水，致使南井的水源能一直处于溢满的状态。南井水源的不竭就从中保证当地的百姓有足够的水源供应，从而解决了百姓的饮水及用水问题。

六井修复的隔年，一场大旱灾席卷了江淮大片土地，使江淮浙各地的井水都枯竭了，百姓的生活因缺乏水源而苦不堪言。当时，水贵如油，许多地方的人都以小瓦罐贮水，作为极珍贵的礼物馈赠亲友。然而，唯有杭州人民因有这六口重新整治过的水井，所以不仅饮水不愁，而且还有足够的泉水用于洗澡和喂养牲畜，使到他们免于干旱之灾。“饮水不忘掘井人”，当时，杭州百姓无不从心底里感激这两位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的好官长。（王水照、崔铭，2002：73）“方是时，汲者皆诵佛以祝公”（苏轼，1986：380），每当人民要汲水的时候，都会想起苏轼及陈襄的恩泽，对二者心存感激之情，甚至还诵佛来为他们祈福，可见苏轼浚井之功已驻入当地人民的心田。

从苏轼疏浚六井的功绩看来，到杭州后，苏轼并不只是陶醉于杭州的湖光山色当中，他也为当地的人民作出不少的贡献。清代汪志伊在其《西湖诗》中曰：“唐有李白宋有苏。忧民之忧乐民乐，三贤刺史如斯夫。”（汪志伊，2004：656）言中之意就是，杭州百姓在唐代时有李泌及白居易，而宋代时则有苏轼这位以民生为主，急民所急的刺史为杭州人民修浚六井，解决了他们的水源问题。然而，苏轼对杭州当地人民的贡献会比李泌及白居易来得大，因为苏轼除了把湮塞的六井整治好之外，他还为百姓解决了大旱灾所带来的苦难，这是李泌和白居易无法超越的。

通过整治六井的这件事情，苏轼认识到身为地方官在各个方面都不能忽视人民的需求，从中他也得出了水对人民的重要性。因此，他在《钱塘六井记》中才会感慨地说：“余以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于井竭，非岁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岂独水哉？”（苏轼，1986：380）在此，苏轼对执政者发出谆谆告诫，从而也带出了他“防范于未然”之先见。他认为“万事皆存也”，常有的东西，存在；不常有的，也是存在。而水为人每日所需之品、人之所急，但干旱是不常有之事，然天下人的通患就是以为干旱不常有，故常会忽视水的重要性，不到紧要关头皆不知水的不可缺。故此，苏轼欲以此来告诫后人，因为有备方能无所患，所以凡事都应防范于未然，未雨绸缪。

进而，苏轼强调，不只是水，其他的东西也一样，当它的存在价值还未被发现时，它还是平平无奇，还是无法突显出其重要性，但是，一旦缺少了它，其价值才会被展现出来。从而，他也以此来反衬自身的命运。虽然在朝廷中，他因对新法持有不同的看法，故无法得到宋神宗的认同，以施展其政治抱负。然而，这并不代表他无用于世，因为，杭州这个地方的人民急需一位像他一样能为百姓尽心尽力的地方官。到了杭州之后，虽然新法持续地进行着，但是，只因在苏轼的管治之下，人民才得以过上安定的生活。如果人民能过上安定的生活，民心就可安定，民心可安定之情况下，对于统治者来说则易进行统治。

纵观全文，苏轼将钱塘六井的由来及整治六井的过程，都一一写入《钱塘六井记》中。透过苏轼与陈襄合力整治六井的过程足见身为地方官的苏轼对于杭州人民无私奉献、尽心尽力的经世济民精神，从而也展现出他在杭州任通判之际所留下能

让当地人民传诵的政绩。所以这次外任到杭州对于苏轼来说，其实并不是人生中的不幸，而是人生中的大幸。就当地人民而言，有苏轼这位地方官是他们万分的荣幸，因为，苏轼治水之举让他们得以解决水源的问题。总的来说，杭州的人民从苏轼身上获得恩泽，故苏轼治水便民之举，令百姓感恩戴义，备受世人的景仰。

在杭州这段期间，苏轼也获得同僚之间的谅解，开诚相见，互相帮忙，这与他在朝廷的党政斗争的处境截然不同，使得他在杭州这个地方得以施展其政治理想与才能。正由于苏轼具有这种政治理想，才使他关注民生民情，了解他们所需，故此才会写出《钱塘六井记》这种反映社会人民的疾苦及灾难之文章。

## 第四章 苏轼之西湖情结

杭州自有“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孔凡礼，2005：235）”的美称。而“钱塘为东南佳丽，而西湖为之最。”（史铿，2004：983）杭州倚湖而兴，因湖而名，以湖为魂。（王国平主编，2004：1）在杭州众多地方之中，杭州西湖尤为引人入胜，其景色最为宜人。

对于“西湖”的形成及其名字的由来，在《西湖游览志·西湖总序》中有详尽地论述：“西湖，故明圣湖也。周绕三十里，三面环山，鸡谷缕注，下有渊泉百道，潴而为湖。汉时，金牛见湖中，人言明圣之瑞，遂称明圣湖。以其介于钱塘也，又称钱唐湖。以其输委于下湖也，又称上湖。以其负郭而西也，故称西湖云。”（田汝成，2004：9）由上可见，“西湖”历来都有许多别称，例如金牛湖、明圣湖、钱塘湖及上湖等等。然而，西湖在众多名称之中是较广为人知的。

历代以来，有不少文人雅士徜徉于西湖山光水色当中，并将西湖作为其文学创作中的题材，从而使西湖染上一种浓厚的文化气息。如唐代白居易有数首诗歌就是以西湖为题材，如《余杭行胜》、《湖上夜饮》、《湖上招客送春泛舟》、《西湖留别》、《杭州回舫》及《钱塘湖春行》等。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诗人的诗歌里都以西湖作为他们诗歌的主题，如范仲淹的《西湖绝句》、刘禹锡的《和四川李尚书汉州微月游房太尉西湖》、欧阳修《初夏西湖》及董斯张《夜泛西湖》。

西湖的游历者除了上述的诗人之外，苏轼是当时对西湖最情有独钟的文人。在《苏东坡轶事汇编》中有写道：

## “东坡镇钱塘，无日不在西湖”

（颜中其编注，1984：179）

苏轼倅杭时期，除了处理地方的政事之余，他还具有游历当地的山水美景的经验，而西湖就是当年他通判杭州时的常去处。所以，杭州西湖提供了苏轼一个很大的创作平台，为他在文学创作上提供了许多丰富的诗材，增添了许多灵感，从而使其大量的“西湖诗”在这时应运而生。而苏轼孕育于杭州湖光山色的诗就如同西湖变幻莫测的景色一样，内容变化多端，当中所蕴含的情感思想更是深厚复杂。

在以下的第一小节中，笔者将从苏轼抒写西湖各种各样的景色来对其“西湖诗”进行解析；在第二小节中，笔者将会从苏轼所抒写的“西湖诗”来看其那时候的心情、政事遭遇及其对新法之看法。由于当时苏轼的所创作的诗歌作品不胜数，故经笔者的慎重考量之下，在下两小节中，笔者将对其当时主要的“西湖诗”如《饮湖上初晴后雨》、《夜泛西湖五绝》、《湖上夜归》、《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及其二及《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来进行论述，并以《菩萨蛮·秋雨湖上萧萧雨》来作补充论述。在此，由少掌握多，由繁化简使的筛选法使笔者对苏轼的创作有更全面掌握，并且借由这几首诗词的核心主题来展现他在杭州时期的创作。

## 第一节 情景交融——西湖之美态呈现

杭州的山水阴晴雨雪，昼夜晦明，四时变换；无论是秀丽的、清幽的、壮阔的、雄奇的，乃至怪异的、万象纷呈、变幻无穷的西湖景色，都会引起苏轼的兴趣，触发他旺盛的诗情。（杭州出版社，2010：4）故此，阮元才会在《嘉庆三年西湖始建苏公祠志事》中说：“西湖之景甲天下，惟公能识西湖全。”（阮元，1967：789）在西湖的感召下，苏轼的创作灵感喷涌而出，写下了许多关于杭州西湖的美好诗歌，并将西湖形形色色的景色透过其“西湖诗”来呈现。于是，倅杭三载的苏轼就与西湖结下了不解之缘。

西湖，它是一首诗，是一幅天然的图画。西湖在苏轼的笔下得到了最完美、最传神的描绘，且苏轼的诗情在西湖的美景中，也得到了最充分、最全面的展示。在《说苏轼的西湖诗》中，夏承焘所给予苏轼的“西湖诗”高度的评价就鉴证了苏轼在其“西湖诗”中的成就：“他的西湖诗是历代西湖文学中一串光彩夺目的明珠。”（夏承焘，2004：942）

在他多首描写西湖的“西湖诗”当中，常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句，且最广为流传的就是熙宁六年（1073）作于杭州的《饮湖上初晴后雨》这首七言绝句。其中，以第二首尤为完美之作。在这首诗歌里，苏轼以浅显易懂、新颖贴切的比喻，使它成为千古绝唱（王水照、崔铭，2002：63）：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1999：430）

在这首诗歌中，苏轼首先对当时西湖的湖光山色进行描写。他先从平静开阔的湖面开始着笔。晴天的西湖，在阳光的照射之下，粼光闪闪，水波荡漾；而雨中的西湖犹然让他怦然心动，云朵朦胧、山色迷茫，使西湖景色呈现出别有一番风味的姿态。苏轼从中也带出了，无论是晴天抑或者是雨天，西湖的风景依旧迷人。

当中，“潋滟”二字可见西湖水光波动之样貌，同时，又可见其色泽之新奇，故此，此景象可说是已达至审美之境界；而“空濛”二字则呈现“细雨迷茫、若有若无之情形”（苏轼，2010：849），从中给予人一种镜花水月之感。虽然，其当中的美是可以意会，然而，却难以用语言来传达，故这就令人产生无限的冥思遐想。苏轼在这首诗歌的首二句中不仅对西湖的景色进行了生动的描绘，而且他也在气候变幻中捕抓西湖景色的变换，可见苏轼在赞赏西湖景色之余，也“于歌唱自然中寄寓了作者的审美理想。”（苏轼，2001：10）

在这美景衬托之下，苏轼就以貌取神，拟人咏物，将西湖比喻为西子，借西子的美貌来衬托出西湖的风景。陈善在《扞虱新话》卷八曰：“东坡酷爱西湖，尝作诗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识者谓此两句已道尽西湖好处。……予谓此诗又是为西子写生也。要识西子，但看西湖；要识西湖，但看此诗歌。”（陈善，2002：128）在“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1999：430）这两句诗中，苏轼就展现出西湖的神韵，说明了西湖就如风华绝代的西子那样，无论晴天或雨天，西湖旖旎的风光还是那么怡人，从而道尽了西湖之美。所以，要认识西湖，最好的途径就是透过苏轼的这首诗。除此之外，苏轼也借景抒情，展示出他对

西湖情有独钟之情，使他对西湖深厚的喜爱之情表露无遗，从中也证明了西湖是一个让他心旷神怡、念念不忘的好地方。

苏轼是将西湖比喻成西子的古今第一人。西湖，在苏轼的笔下，地位得以大幅度提高。在此之前，西湖并无“西子湖”此名，但苏轼此诗一出，杭州西湖便有了“西子湖”此称。这从《说杭州·说水》中得以论证：“宋苏东坡有‘欲把西湖比西子’之诗句，遂有此名。此名最通用。”（钟毓龙，2004：102）现今若提起“西湖”，无人不知晓，当人们一提及西湖，就会联想到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这首诗歌，这就正好体现出苏轼在任杭州通判之际之贡献。

在外任杭州这段期间，在处理地方政事的闲暇，苏轼的文艺活动也得到极大的开展。（张志烈等注，2010：6）西湖正是他游历杭州湖水山川的常去之处。苏轼对西湖心存着一种特别的情感，而他这种情感在其诗歌中更是表露无遗。熙宁五年（1072）七月的一个月夜，苏轼因游览西湖而写下了《夜泛西湖五绝》。在《夜泛西湖五绝》中，苏轼清楚地记载了他夜游西湖时的整个经过：

新月生魄迹未安，才破五六渐盘桓。

今夜吐艳如半璧，游人得向三更看。

三更向阑月渐垂，欲落未落景特奇。

明朝人事谁料得？看到苍龙西没时。

苍龙已没牛斗横，东方芒角升长庚。

渔人收筒及未晓，船过惟有菰蒲声。

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

渐见灯明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

湖光非鬼亦非仙，风恬浪静光满川。

须臾两两入寺去，就视不见空茫然。

（苏轼，1999：352-353）

苏轼在暮色降临、明月将出而又未出之时，开始在西湖上泛舟。随着落花飘香，湖边寺院灯光的闪烁，他亲眼望见吐艳如长虹的初露新月，照得半壁江山通明。三更时，明月渐重，景观尤奇。一直到东方将明未明，湖光非鬼非仙，启明高照，月落西方之后，他才茫然归去。（杭州出版社，2010：64、66）

在这首诗歌中，苏轼扣紧“夜泛”二字来对他这首诗歌进行描写。所以，在诗歌当中，他即描写月夜的西湖景色，也描写黑夜西湖的景色。当时，苏轼去夜游西湖的目的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赏月，而是为了要观看西湖夜景的一种奇特岚影“湖光”。查慎行引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中的〈四圣水灯〉曰：“西湖四圣观前，每至昏后有一灯浮水上，其色青红，自施食亭南，至西陵桥复回。风雨中光愈盛，月明则稍淡，雷电之时，则与电争光闪烁。”（周密，1988：206）冯应榴案曰：“西湖游览志略同，并云‘此湖光也’。”（苏轼，2001：334）“湖光”，指每天黄昏会出现在西湖湖面上的一种红光，这种“湖光”且亮明则稍淡，风雨中则光愈炽；远看则存，近看则无，往来倏忽，游移不定。（杭州出版社，2010：66）而苏东坡的“湖光非鬼亦非仙，风恬浪静光满川。须臾两两入寺去，就视不见空茫然。”（苏轼，1999：353）之句，想必指此。在夜阑人静的夜里，湖面平静，在月光的照射之下，湖光

清晰可见。湖光的“非鬼亦非仙”给人一种扑朔迷离之感，让人觉得变幻莫测。而苏轼也从这夜泛西湖所发现的湖光之中，独自寻得了别有一番乐趣的滋味。

再者，苏轼也将呈现出四季变化的西湖写入他的“西湖诗”中。如作于熙宁五年（1072）四月的《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其中，苏轼对四季美景如画的西湖景色描写得非常细腻：

夏潦涨湖深更幽，西风落木芙蓉秋。

飞雪暗天云拂地，新蒲出水柳映洲。

（苏轼，1999：338）

“蔡准，京之父，官侍郎。”（苏轼，1999：337），苏轼通判杭州之际，蔡准郎为钱塘尉，与苏轼有交往，故苏轼“应蔡准邀游西湖”（孔凡礼，2005：224）。在上述的诗歌中，苏轼写的就是他和蔡准郎一同游西湖之过程。

在此诗中，“‘夏潦’四句：写西湖四时风景，一句一景。”（苏轼，2010：672）苏轼以各式的场景来带出不同季节的西湖景色，如夏天水涨湖深，幽蓝妩媚；秋天的微风送爽，粉红、洁白的莲花次第开放；冬天云雪茫茫，水天相接在一起；春天新蒲出水，崔柳倒映湖面，别具清新明丽之姿，真可谓“湖上四时看不足”（苏轼，1999：338）。（王水照，崔铭，2002：61）从上可见，无论当时的季节是春夏或秋冬，都无损西湖美态的呈现。反之，在不同的季节里，西湖都可从不同的角度来呈现出其独特的一面。苏轼在杭州时，为了要赏阅西湖四季景色之美，无论是阴晴

或雨雪，他都会畅游西湖，无形中就透露出他心中对西湖情有独钟的那份微妙的感情。

除此之外，苏轼在他抒写的“西湖诗”中，不仅描写出西湖四季景色之美，而且在《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中，苏轼也描写了西湖的夏天阵雨：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苏轼，1999：340）

这首诗歌是熙宁五年（1072）六月二十七日苏轼登上望湖楼，望着湖上雨后清静的湖水，兴致大发之作。（胡明刚编，2002：100）在此诗中，呈现出的是一幅苏轼在望湖楼看到西湖陡雨陡晴的景色。当时，乌黑的云朵就像打翻了墨汁似的突如其来，大雨继而倾盆而下，然而，这却无法将西湖的所有山峦遮给掩盖掉。西湖当时虽处在这若隐若现的山峦之间，但是，这并没有隐藏起西湖那壮阔的景致，反之，这场景让苏轼顿生奇妙之感，使之视野更为辽阔，同时更让其对西湖的情感升华。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苏轼，1999：340）云雨随风势去之后，一切又恢复平静，西湖天水与天同色相连的情景再次出现，西湖风光依旧明媚。从字面看，苏轼描写的是刹那间变化无常的天气；实则以跌宕之笔反映出西湖的平静。（裘本培，2012：82）所以，在苏轼的笔下，西湖的夏天阵雨形象被他刻画得栩栩如生。对于苏轼的这种描写手法，夏承焘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前人写西湖平静，何曾有过这种手法。”**（夏承焘，2004：946）可见在苏轼之前是没有人以此手

法对西湖景色进行描写刻画，而这也再一次肯定了苏轼通判杭州时期在文学上的成就。

再来，苏轼除了对西湖的四季之景及夏天的阵雨进行描写之外，他也在其诗歌中呈现出冬天将雪未雪时的湖上景象。如熙宁四年（1071）十二月，轼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孔凡礼，2004：625），所作的《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就是写出西湖此景色：

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

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

（苏轼，1999：317-318）

“东坡到官三日，访勤于孤山之下，遂赋此诗。”（苏轼，1999：317）苏轼第一次来杭，三天后就去孤山拜访惠勤、惠思二僧，而此诗是他在拜访二人时所作的诗。在这次的游山访僧的过程中，苏轼就将西湖“云雾弥漫、欲雪未雪”的气候图呈现在读者眼前，让读者深深体会到冬天即将来临的气息。继而，苏轼就以湖上的气候变化的衬托之下，更进一步地将“楼台明灭山有无”（苏轼，1999：317）的情景带出，使西湖处在一种若隐若现的朦胧美之情景当中。从中可看出，苏轼那种善于从动态中去捕抓景物的特点（王水照，1981：29），使西湖处在一种若隐若现的朦胧美的情景之中。

由上可见，苏轼在其“西湖诗”中对西湖的景色进行深刻细腻的描写。王文浩评定苏轼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及《和蔡准郎中邀游西湖三首》“随

手拈出，皆得西湖之神。”（苏轼，2010：688）然而，在笔者看来，苏轼不仅只在这两首诗歌中展露出西湖传神的一面，而且在本论文中所论及其他“西湖诗词”中皆可看出西湖的面貌。从其诗中不仅能体现出西湖所拥有的天然景致，且透过不同季节、不同气候所呈现出的西湖面貌更展现出苏轼对西湖景色的掌握能力。

总而言之，西湖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四时朝暮，阴晴雪月，无所不宜，惟游者心会之，并不限于一隅一角之状。”（钟毓龙，2004：115）无论是在春夏或秋冬或者是月夜，西湖所体现出来的景色都会让人各有领会。所以，苏轼才会说道：“西湖天下景，游者无愚贤。浅深随所得，谁能识其全。”（苏轼，1999：644）在这当中无疑存在着他对西湖的评价。

在如番美景映现之下，通判到杭的苏轼在游西湖的过程中获得许多乐趣，并且也在西湖留下了不少他的足迹。于此同时，西湖的景色也让苏轼在创作上增添了许多灵感，使他在这一时期创作出不少以“西湖”为题材的诗歌。在苏轼的诗歌中，呈现出的不仅仅是他对西湖美景的陶醉、沉醉，而且他还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对西湖的景色进行抒写，这样的抒写方式就让西湖在他的诗歌当中呈现出更独特的一面。如苏轼在将西湖比喻为西子的此部分中，他就用了新颖的手法对西湖的景色进行刻画，这是其他诗人无法达至的境界。另外，苏轼“西湖诗”的另一特色在于他不仅能将西湖景色的变化写入诗歌中，而且还能在同一首诗歌里同时将西湖四季之景色带出，可见其写作手法层出不穷，变化多端，往往让人耳目一新。

## 第二节 寄情于景——心情、遭遇之表态

在上一小节中，笔者尝试透过苏轼当时在通判杭州时期的几首较为主要的“西湖诗”带出了苏轼对杭州西湖美景的描写。从中，所突显出来的不仅仅是西湖景色优美的一面，苏轼善于刻画西湖景色、技艺高超的一面也得以从这些诗中看出。在这一小节中，笔者将尝试透过苏轼在诗及词中对西湖的描写来看出其当时心境、其在政事上的遭遇及其对新法的看法。

从苏轼在杭州创作的“西湖诗”中看来，他不仅善于刻画西湖的景色，且在其诗歌当中，也有一些是充满着生活乐趣的。如在《夜泛西湖五绝》其三中，苏轼就有如此论及：

苍龙已没牛斗横，东方芒角升长庚。

渔人收筒及未晓，船过惟有菰蒲声。

（苏轼，1999：353）

在此诗中，“**船过惟有菰蒲声**”（苏轼，1999：353）这一句诗歌起了衬托的作用。“惟”一字就突显出在当时的夜里，仅存有的就是船只穿行于菰蒲所发出的声音，而其他声音就荡然无存，从而也将夜里幽深寂静的环境全面地展现在众人眼前。不仅如此，苏轼如此的笔调，也将他孤身游湖的游子心境全盘托出。

在此诗歌中，地点设定了，而在时间上，经苏轼如此一笔的点缀，就将当时趁着天未亮而进行盗钓的渔夫慌张的情景刻画得栩栩如生，使其形象跃然于纸上。笔者认为，苏轼之所以能够如此突出渔夫生动表情，是因为渔人此种表情动作诱发了

他的兴趣，继而引起他的关注，使他更进一步地对渔夫的夜里盗钓行为举动进行观察，最终这举动无形之中就成了他游湖的其中一项乐趣。

然而，“天禧四年，太子太保判杭州王钦若奏以西湖为放生池，禁捕鱼鸟，为人主祈福。”（苏轼，2001：318）在苏轼任杭州通判之际，其实朝廷早已下令禁止在湖上进行任何垂钓或捕鱼的活动，所以，“湖上禁渔，皆盗钓。”（苏轼，2001：333）但苏轼在夜泛西湖之时碰上“渔夫盗钓”事件却没有以实际的行动去给予阻止。笔者认为，在他看来捕鱼是渔夫的职业，但是如果因为君主本身的利益而下令禁止百姓进行捕鱼及垂钓活动，这不仅会给人民带来不便，影响渔夫的捕鱼活动，进而还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收入。从而可见，苏轼对于当时“朝廷与民争利”这一点是反对的。而苏轼在这里所反对的，其实与他在新法中所反对的“与民争利”之观点是相符的，因为二者都是以老百姓为主，以他们的利益为先，所以，这更加证明他是一名爱民如子的好官。

再者，苏轼也喜欢在明月当空之时荡桨湖面，如他在《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二中有写道：

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

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

（苏轼，1999：340）

苏轼悠闲地斜靠在船上铺展的枕席之上，借着银色的月光，看成群的鱼鳖随波而来，在船边嬉戏；看盛放得荷花袅袅婷婷，迎风飘曳。湖畔青山随小船的起伏而起伏，

天上明月随小船的徘徊而徘徊。（王水照、崔铭，2002：62）苏轼从鱼在池中自由畅游的行为及荷花不为任何人所私有，凭自身的力量以千姿百态开放的情景，从中刻画出鱼儿及花儿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意境。苏轼以此来衬托出他自身当时所处之境，当中也意涵着苏轼希望像它们一样，能在杭州这里不受政治权利的束缚，希望在为人民办事的同时，也能尽情地享受当地的西湖景色。于是，在如此惬意的环境之下，苏轼就放开怀抱地尽情享受山水所带给他的乐趣，因此，他心情大为美好，履行起公务也特别愉快。

此外，西湖，是一个常让苏轼流连忘返，一直到深夜，才恋恋不舍地踏上归途之地。由此可看出，苏轼对于西湖的钟爱程度已经超出一般常人对西湖的喜爱之情，他沉醉于西湖的美丽景色更胜于美酒当前，就如他在熙宁六年（1072）二月作于杭州的《湖上夜归》有这么说道：

我饮不尽器，半酣味尤长。

篮兴湖上归，春风吹面凉。

行到孤山西，夜色已苍苍。

清吟杂梦寐，得句旋已忘。

尚记梨花村，依依闻暗香。

入城定何时，宾客半在亡。

眼睛忽惊矍，繁灯闹河塘。

市人拍手笑，状如失林麓。

始悟山野姿，异趣难自强。

人生安为乐，吾策殊未良。

（苏轼，1999：440）

“首云：‘我饮不尽器，半酣味尤长。’作者自言饮酒宿习，此次亦然。半酣未醉，然在朦胧中。”（孔凡礼，2004：696）美景当前，苏轼不禁再次拿起酒杯，吟咏诗歌。此刻他虽未醉，然酒意却使他“吟倦而睡，睡醒复吟，神智处于似睡非睡、半醒半睡之中。”（苏轼，2010：874）然而，还意犹未尽时，却天色已晚，所以他只好带着半醉、不舍的心情离开。在离开之后，他“尚记梨花村，依依闻暗香”（苏轼，1999：440）。在他记忆的脑海里，山水草木醉人的清香气味还是挥散不去。“知作者自梨花村来，此时乃梨花季节。暗香依依，作者似以为此时自身尚身在梨花村，‘尚记’和‘半酣’可证。”（孔凡礼，2004：696）存在于他脑海记忆里的是他故乡之梨花香昧，此时的他忆起了梨花的香味，从而就将他游子想家之情表露无遗，从中也说明了西湖的一切事物早已深深烙印在他脑海的深处。

再者，在“眼睛忽惊矍，繁灯闹河塘。”（苏轼，1999：440）这两句诗中则展现出“人生鼎沸，作者自朦胧中清醒。”（孔凡礼，2004：696）之场景。“河塘”即杭州街道之名，在宋代时“居民甚盛，碧瓦红檐，歌管不绝，官长往往游焉。”

（苏轼，2010：874）而苏轼是其中一位。在此，苏轼不仅刻画出河塘街道的繁盛情景，从中也展现了河塘街歌舞升平的繁华景象，由此看来，在苏轼这位地方官的管治之下，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生活。

在“市人拍手笑，状如失林麓。始悟山野姿，异趣难自强。人生安为乐，吾策殊未良。”（苏轼，1999：440）这六句诗中，苏轼叙述了“市人与通判之间亲密无间。”（孔凡礼，2004：696）而“‘失林麓’叙失态，欲藏而无处藏，而此正显示出作者极

为真率之一面。”（孔凡礼，2004：696-697）在当时社会里，苏轼能如此不忌身份地将他最真实的一面表现出来，真的实属难得。苏轼能放下身段，不在乎阶层之间差别的此种行为无意间就拉近了他与百姓之间的关系，并且让百姓对这位地方官留下良好的印象。

末二句“‘人生安为乐，吾策殊未良。’似有从仕之悔。其实不然，作者如实记录下此场面，正以其难忘有记下价值，其内心正以此为乐也。”（孔凡礼，2004：697）。从中看出了，作者之所以会将此事情记载于他这首“西湖诗”中，必然有其重要的价值存在。王文浩注厚曰：“安身为乐，无忧为福。”（苏轼，2001：414）。杭州通判的这份官差最初是要以此来避开朝廷中的种种祸害，然而，这并没有让他后悔，反而，在这里作者带出的是，他从游览西湖中获得了他人生的乐趣，在与人民相处得愉快的情况之下，他内心也因此而获得快乐。由此可见，苏轼在杭州的生活与朝廷的生活相比较起来，前者让他的生活更加有意义。所以，这也就是他把这场面记载下来的真正意义所在。

另外，在《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这首诗歌里，苏轼除了写出他与蔡准郎中游西湖的过程及西湖风光之外，其实这首诗歌更能作为苏轼个人心情的写照。查慎行引宋人吴革《北厅记略》曰：“熙宁中，苏文忠公由史官来贰杭郡事。时方行新法，公常因法便民。”又引姚岩《东厅续记》云：“先生以奉常博士倅杭，于时民淳事简，犹有‘朝推囚，暮决狱’之诗，其勤于王事如此。”（转引自苏轼，2001：316）当时各地都在推行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浙江一带还兼行水利法、盐法，而杭

州也无法豁免；身为杭州通判的苏轼，在此情况之下，他也必须依照朝廷所颁布的命令来实行其职务。

然而，当时新法为人民带来了许多苦难及种种的不便，苏轼心里纵横交织着对新法的诸多不满，但是，他却不得不以新法来刑民（盐囚），所以，这使他内心里充满着矛盾，这首诗歌就恰恰体现出了他矛盾的心情：

**“君不见，钱塘游宦客，朝推囚，暮决狱，不因人唤何时休”**

（苏轼，1999：338）

苏轼在《上文侍中论榷盐书》中谓：“两浙之民以犯盐得罪者，一岁至万七千人而莫能止。”（苏轼，1986：1400）那时候因违反新法而被捕入狱的人很多，而在杭州因违反盐法而获罪的，一年就多达一万七千人，所以，他“每执笔断犯盐者，未尝不流涕。”（苏轼，1986：1397）可见对于新法的执行，他虽有万般的不愿，然却不得不以法来处刑盐犯。

由上可见，苏轼到任杭州之后就一直忙于处理囚犯、审问囚犯、批阅公文，不得休息（曾枣庄，2006：78），繁忙的公务使他分身不暇，也因此苏轼才以“游宦客”来自我称谓。其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关注在民生身上，直至朋友的邀约外游，他才会暂时将手上的工作放下，带着闲情去享受西湖优美的景色。

从上述的诗歌中可见，透过对西湖景色的描写，苏轼使之“西湖诗”蕴含着游子的心情，从而他也将对新法之不满宣泄在诗中。再者，他在描写西湖景色之际，

将离愁别绪之感融入其中。如在《菩萨蛮·秋雨湖上萧萧雨》除了对秋天雨景的西湖进行描写之外，他也透露出与友人离别之伤感：

**秋风湖上萧萧雨，使君欲去还留住。**

（邹同庆、王宗堂，2002：81）

这是熙宁七年（1074）七月，苏轼作于杭州之词作。（邹同庆、王宗堂，2002：81）

当时，陈襄因任期届满，接获钦命，是日将离开杭州，移任应天府。然因与陈襄共事长达二年（熙宁五年至熙宁七年六月），苏轼与陈襄建立之情谊，尤为深挚。

（李立明，2007：112）而今离别在即，苏轼的离愁别绪之感涌泉而出，于是，他就将离别之情透过此情此景写入这首词作中。

“**秋风湖上萧萧雨**”（邹同庆、王宗堂，2002：81）秋天的西湖，在骤急的雨水落下后，显得格外冷落凄清。在诗中，苏轼就透过西湖天色营造，将当时他与陈襄分离的不舍情景刻画得淋漓尽致，从中也抒发了他无法挽留挚友离去之悲痛愁绪。

综上所述，苏轼在写西湖宜人景色的同时，也将自己的人生感悟、理念融汇其中，使诗歌中承载着他心中所欲表达的事物。除此之外，在上述的诗歌当中，苏轼也将当时他的政治遭遇与其在当时所履行的职务之难处一一表现在读者眼前。从而，读者也可以从他与当地人民相处愉悦的情况来看出他是一名深受人民拥戴的地方官，更看出他在杭州外任的生活远远比他在朝廷中面对新旧党政的斗争来得更为轻松愉快。苏轼“西湖诗词”中更为特别的一处在于，他在描写西湖的风光的同时，也将其个人的感情如游子想家之情以及与友人分离之情写入他的西湖作品当中。由此看

来，杭州西湖确实让苏轼的此次外任增添了不少人生阅历，同时，畅游西湖也让他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所以，王水照才会在《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说道：

**“苏轼作品的动人之处，在于展现了可供人们感知、思索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表达了他深邃精微的人生体验和思考。”**（王水照，2004：1）

最后，通过本篇论文方能清楚地用“杭州西湖”把“凤翔签判”“密州超然”、“徐州治河”、“黄州赤壁”这些苏轼阶段研究的主题贯串起来，使之连成一线，成为整体性的苏轼研究。因“杭州西湖”恰为其中，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所以，通过现在的西湖研究成果，可推测到凤翔研究、密州研究、徐州研究、黄州研究等。于此，“杭州西湖”主题研究的重要性就更显而易见。

## 结语

综上所述，苏轼选择外任的主要原因莫过于其政治看法无法得到认同及遭受谢景温诬奏这一事件。在表面上看来，外任是苏轼为情况所逼而作出的抉择，然换个角度进行较为宏观的思考，笔者认为，外任对于苏轼来说，是他仕途上的另一开端，而不是他政治生涯的结束点。因为，若从苏轼外任到杭州的生活来看，虽然其杭州的际遇与其在朝中当官的官场生活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而在文学创作上也明显呈现出不同，然而，这些差异却是将苏轼在杭州时期成就显耀的一面呈现出来的关键点。

如外任到杭州的期间，苏轼不仅有机会饱览当地的山川美景，而且也使其在履行地方公务上也获得了锻炼。这时，他能够以其身为地方官的身份去亲自接触各阶层的百姓，并将其政治理想用于百姓身上，以实际行动为当地的老百姓解决他们所面对的困境，这就与他在朝中当官的日子有着重大差别。

一直以来都以“经世济民”精神作为主导思想的苏轼，虽然在朝廷里不被重用及受到政敌的诬奏、陷害，但是，这些事情都无法打击他一路以来所持有的那股政治抱负。在此政治抱负中，蕴含着他为人民服务的热忱，而这就在其通判杭州时实践于杭州百姓身上。所以，苏轼在地方民政上的建树，厕于历代能吏之列，并无愧色。在《钱塘六井记》当中就详细地记载了苏轼助太守陈襄修浚六井一事。文中除了展现出苏轼对杭州的影响之外，从而也带出了他对当地人民的影响。苏轼不仅将杭州人民长期以来所面对的水源问题彻底解决，也让当地人民在面对旱灾时能有

足够的水使用。在人民生活处于较好的条件之下，杭州自然而然也因此而繁荣富裕起来。从中，就可看见苏轼在地方上是颇有政绩的。虽然他在朝廷时政见不被接纳，不受神宗的重用，但这却无妨碍他处理事务的能力。无可否认，苏轼的确是一位以民为主、关心民瘼的好官吏。

而在文学创作的发展上，苏轼依然饱有对文学的热诚，从其文字的气势就可见当中附有深厚的艺术感染力。杭州西湖不仅让他有感官上的视觉感受，也使其创作灵感源源不绝，写下了为数不少的“西湖诗”。在其抒写的“西湖诗”中对不同季节、时节的西湖风景进行不同的描写，在字里行间无疑让读者深深地感受到当时西湖四时变化无穷的景色之外，更让读者深刻感受到西湖因经苏轼对其的描写而染上了浓厚的文学气息。虽然在诗歌当中，苏轼主要是以描写风景为主，但是，其心情及政治遭遇也从中体现出来。对于新法的烦扰，苏轼也借着对“西湖诗”的创作来抒发其新法的不满之情。所以经由苏轼所刻画出的西湖实另有一番美感存在，而不像一般的写景诗规范，中规中矩地对西湖景色进行描写记录而已。故在此，笔者大略将苏轼的“西湖诗”归结为四大特点：一是内容丰富；二是风格多样；三是其心情写照；四是对新法所持有的看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苏轼自求外任到杭州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在杭州，苏轼因治六井而留下为当地百姓讽诵的佳绩；于此同时，他的文学创作在此地也有相当不错的发展。相较于京城复杂的党争关系，苏轼在杭州的日子是轻松而惬意的（范春芽，2004：134）。所以苏轼曾说过：“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苏轼，1999：341）杭州的山川湖水让他寻找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使在他

的有限的生命里，可以留下许多难以忘怀的回忆，故在无形之中，他已把杭州当成他的第二个故乡，从中流露出了他对杭州浓厚之情感。

## 引用书目

### 一、 古人典籍

1. 白居易（2011）：《白居易文集校注》（第四册）（谢恩炜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2. 陈邦瞻（1977），《宋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
3. 陈善（2002），《扞虱新话》，《续修四库全书》（第 1122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4. 陈襄（2003），《古灵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093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5. 顾炎武（2007），《日知录校注》（中册）（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
6. 刘昫等撰（2002），《旧唐书》（第十三册），北京：中华书局。
7. 李焘（2004），《续资治通鉴长篇》（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
8. 柳永（2005），《乐章集》（高建中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9. 墨浪子（1999），《西湖佳话》（陈美林、乔光辉校注），台北：三民书局。
10. 欧阳修、宋祁（1997）：《新唐书》（第十四册），北京：中华书局。
11. 潜说友（2004），《咸淳临安志》，《西湖文献集成》（第八册），杭州：杭州出版社。
12. 软元（1967），《擘经室集》（第二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3. 沈德潜辑、沈龙云主编（未注出版年月），《西湖志纂》（第一册），台北：文海书局。
14. 沈德潜选评、于石校注（1998），《唐宋八大家文读本》（下册），合肥市：安徽文艺出版社。
15. 史铿（2004），《西村十记》（徐晓点标），《西湖文献集成》（第三册），杭州：杭州出版社。
16. 苏轼（2001），《苏轼诗集合注》（第一册）（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7. 苏轼（1986），《苏轼文集》（第一册、第二册、第三册、第四册、第五册）（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8. 苏轼（1999），《苏轼诗集》（第一册、第二册、第六册）（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19. 圣祖御选、徐乾学等奉敕编注（2003），《御选古文渊鉴》（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 苏辙（1990），《苏辙集》（第三册）（陈宏天、高秀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1. 田汝成（2004），《西湖游览志》，《西湖文献集成》（第三册），杭州：杭州出版社。
22. 田汝成（2004），《西湖游览志余》，《西湖文献集成》（第三册），杭州：杭州出版社。

23. 王安石（2005），《王荆公文集笺注》（上册）（李之亮笺注），成都：巴蜀书社。
24. 汪志伊（2004），《西湖诗》（顾志兴标点），《西湖文献集成》（第二十六册），杭州：杭州出版社。
25. 元脱脱等撰（1977），《宋史》（第十一册、第三十册、第三十四册），北京：中华书局。
26. 周密（1988），《癸辛杂识》（吴企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7. 钟毓龙（2004），《说杭州》，《西湖文献集成》（第十一册），杭州：杭州出版社。

## 二、 今人论著

28. 洪本健（1999），《宋文六大家活动编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9. 胡明刚编（2002），《苏轼传》，北京：京华出版社。
30. 杭州出版社（2010）：《苏东坡与西湖》，杭州：杭州出版社。
31. 孔凡礼（2004），《三苏年谱》（上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32. 孔凡礼（2005），《苏轼年谱》（上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33. 李道英（2005），《唐宋古文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34. 沈松勤（2005），〈北宋文人与党政〉，《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2-2003），武汉：武汉出版社。

35. 王国平主编（2004），《西湖志·总序》，《西湖文献集成》（第四册），杭州：杭州出版社。
36. 王水照（1981），《苏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37. 王水照（1994），〈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苏轼论稿》，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
38. 王水照（1999），《苏轼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39. 王水照（2004），〈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中国苏轼研究》（第一辑），北京：学苑出版社。
40. 王水照、崔铭（2002），《苏轼传：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41. 王水照、朱刚（2006），《苏轼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42. 夏承焘（2004），《说苏轼的西湖诗》，《历代西湖文选》，《西湖文献集成》（第十四册），杭州：杭州出版社。
43. 颜中其编注（1984），《苏东坡轶事汇编》，长沙：岳麓出版社。
44. 张惠民、张进（2004），《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
45. 邹同庆、王宗堂（2002），《苏轼词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46. 张志烈等注（2010），《苏轼全集校注》（第一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47. 曾枣庄（2006），《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48. 曾枣庄（2006），《苏轼图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 三、 期刊论文

1. 曾征平（2001），〈王安石变法时期苏轼不属于保守派——王安石、苏轼经济思想之比较〉，《重庆教育学院学报》，页 54-58。
2. 范春芽（2004），〈苏轼与杭州诗僧诗文酬唱及其相互影响〉，《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第 35 卷第 2 期，页 133-137。
3. 裘本培（2012），〈苏东坡：千古绝唱西湖诗〉，《杭州（周刊）》，第 12 期，页 82-83。
4. 吴在庆（1997），〈浅谈古代文学教学的文史结合的方法〉，《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第 4 期（总第 62 期），页 34-37。

### 四、 硕士论文

1. 梁惠兰（2008），《苏轼治水及相关作品考论》，未出版硕士论文，高雄：国立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夜间专班）。
2. 宋仁正（2004），《宋代的西湖与杭州》，未出版硕士论文，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

附录（一）：苏轼通判杭州作品编年表（熙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至熙宁七年九月下旬）

年份	散文	诗歌	词
熙宁四年	《上杭州教官吕穆仲书》	《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	
		《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	
		《地炉》	
		《纸帐》	
		《李杞寺见和前篇复用元韵答之》	
		《再和》	
		《游灵隐寺得来诗复用前韵》	
		《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	

年份	散文	诗歌	词
熙宁五年	《墨宝堂记》	《自径山回得吕察推诗用其韵招之宿湖上》	《浪淘沙·昨日出东城》
	《牡丹记叙》	《和子由柳湖久涸忽有水开元寺山茶旧无花今岁盛开二首》	《花蕊夫人宫调》三十首
	《钱塘勤上人诗集叙》	《越州张中舍寿乐堂》	《浣溪沙·徐邈能中酒圣贤》
	《祭欧阳文忠公》	《姚屯田挽词》	《双荷叶·双溪月》
	《墨妙亭记》	《送岑著作》	《荷花媚·霞苞露荷碧》
	《杂书琴事十首·欧阳公论琴诗》	《雨中明庆赏牡丹》	
	《送杭州进士诗叙》	《惜花》	
	《邵茂诚诗集叙》	《吉祥寺赏牡丹》	
	《与辩才》第二简	《和刘道原咏史》	

年份	散文	诗歌	词
熙宁五年	《上文侍中论榷盐书》	《吉祥寺僧求阁名》	
	《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	《和刘道原见寄》	
	《梦齐铭·叙》	《和刘道原寄张师民》	
	《与康公操都官第一简》	《送张职方吉甫赴闽漕六和寺中作》	
	《凤硃砚铭》	《雨中游天竺灵观音院》	
	《书凤硃砚》	《戏子由》	
	《辩法帖》	《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	
	《杭州请圆照禅师疏》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	
	《刚说》	《七月一日出城舟中苦热》	
	《海月辩公真赞》	《宿余杭法喜寺，寺后绿野堂，望吴兴诸山，怀孙莘老学士》	
	《论高丽买书利害劄子》	《元日次韵张先子野见和七夕寄莘老之作》	
		《宿临安净土寺》	
		《自净土寺，步至功臣寺》	
		《游径山》	
		《自径山回，得吕察推诗，用其韵招之，宿湖上》	
	《宿望湖楼再和》		
	《夜泛西湖五绝》		
	《送渊师归径山》		
	《求焦千之惠山泉诗》		
	《答任师中次韵》		

年份	散文	诗歌	词
熙宁五年		《沈谏议召游湖，不赴，明日得双莲于北山下，作一绝持献沈，既见和，又别作一首，因用其韵》	
		《哭欧阳公孤山僧惠思示小诗次韵》	
		《送刘寺丞赴余姚》	
		《监试呈诸试官》	
		《试院监察》	
		《望海楼晚景五绝》	
		《八月十日夜看月有怀子由并崔度贤良》	
		《催试官考较戏作》	
		《孙莘老求墨妙亭诗》	
		《李公择求黄鹤楼诗，因记旧所闻于冯当世者》	
		《和沈立之留别二首》	
		《和陈述古拒霜花》	
		《次韵答开祖》	
		《周夫人挽词》	
		《梵天寺见僧守诠小诗清婉可爱，次韵》	
		《听贤师琴》	
		《赋秋怀》二首	
《次韵孔文仲推官见赠》			
《戏赠》			

年份	散文	诗歌	词
熙宁五年		《六和寺冲师阡山溪为水轩，苏轼题诗》	
		《冬至日独游吉祥寺》	
		《后十余日复至》	
		《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	
		《和人求笔迹》	
		《送曾巩得燕字》	
		《将之湖州戏赠莘老》	
		《再用前韵寄莘老》	
		《欲往湖州见孙莘老别公辅希元彦远醇之穆仲》	
		《送张轩民寺丞赴省试》	
		《雅种麦行》	
		《和致仕张郎中春画》	
		《和邵同年戏赠贾收秀才》	
		《游道场山何山》	
		《莘老葺天庆观小园有亭北向道士山宗说乞名与诗》	
		《赠孙莘老七绝》	
		《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	
		《赠上天竺辩才师》	
《东阳水乐亭》			

	散文	诗	词
熙宁六年	《可久清顺》	《元日次韵张先子野见和七夕寄莘老之作》	《行香子·过七里濂》
	《书游灵化洞》	《古意》	《祝英台近·挂轻帆》
	《钱塘六井记》	《次韵答章传道见赠》	《菩萨蛮·绣簾高捲倾城出》
	《记宝山题诗》	《法惠寺横翠阁》	《江城子·凤凰山下雨初晴》
	《与郭功父》第四简	《祥符寺九曲观灯》	《瑞鹧鸪·城头月落尚啼鸟》
	《跋蒲传正燕云山》	《上元过祥符僧可久房萧然无灯火》	《瑞鹧鸪·碧山影里小红旗》
	《祷雨天竺观音文》	《往富阳新城李节推先行三日留风水洞见待》	《临江仙·四大从来都遍满》
	《与鲁元翰二首》	《风水洞二首和李节推》	《江城子·玉人家在凤凰山》
	《苏州请通长老疏》	《独游富阳普照寺》	
	《仁宗皇帝御飞白记》	《自普照游二庵》	
	《思聪明说》	《富阳妙亭观董双成故宅，发地得丹鼎，复以铜盘，承以琉璃盆，盆既破碎，丹亦为人争夺持去，今独盘鼎在耳，二首》	
	《题万松岭惠明院壁》	《新城道中》	
	《与端彦》第二简	《山村五绝》	
	《答焕》第一简	《癸丑春分后雪》	
		《湖上夜归》	
		《同曾元恕游龙山吕穆仲不至》	
		《寒食未明至湖上，太守未来，两县令先生》	

年份	散文	诗歌	词
熙宁六年		《次韵孙莘老见赠，时莘老移庐州，因以别之》	
		《赠别》	
		《次韵代留别》	
		《薄命佳人》	
		《吉祥寺花将落而述古不至》	
		《述古闻之明日即至坐上复用前韵同赋》	
		《李钊辖坐上分题戴花》	
		《东阳水乐亭》	
		《于潜令刁同年野翁亭》	
		《于潜僧绿筠轩》	
		《于潜女》	
		《自昌化双溪馆下步寻溪源，至治平寺，二首》	
		《留题徐氏花园二首》	
		《与临安令宗人同年剧饮》	
		《宝山画睡》	
		《五月十日，与吕仲甫、周邠、僧惠勤、惠思、清顺、可久、惟肃、义诠同泛湖游北山》	
《会客有美堂，周邠长官与数僧同泛湖往北山，湖中闻堂上歌笑声，以诗见寄，因和二首，时周有服》			
《席上代人赠别三首》			

年份	散文	诗歌	词
熙宁六年		《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视雷雨，每大雷电，但闻云中如婴儿声，殊不闻雷震也》	
		《弟和子由去岁试举人洛下所寄九首》	
		《赠上天竺辩才师》	
		《和柳子玉喜雪次韵仍呈述古》	
		《观子玉郎中草圣》	
		《立秋日祷雨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	
		《病中独游净慈寺，谒本长老，周长官以诗见寄，仍邀游灵隐，因次韵答之》	
		《病中游祖塔院》	
		《虎跑泉》	
		《佛日山荣长老方丈五绝》	
		《孤山二咏》并引	
		《与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归》	
		《有美堂暴雨》	
		《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	
		《陌上花三首》	
		《宿海会寺》	
		《将军树》	
		《锦溪》	
《石镜》			
《登玲珑山》			
《宿九仙山》			

年份	散文	诗歌	词
熙宁六年		《游东西严》	
		《宿海会寺》	
		《径山道中次韵答周长官兼赠苏寺丞》	
		《洞霄宫》	
		《初自径山归，述古招饮介亭，以病先起》	
		《明日重九，亦以病不赴述古会，再用前韵》	
		《九日，寻臻闍黎，遂泛小舟至勤师院，二首》	
		《九日，舟中望见有美堂上鲁少卿饮，以诗戏之，二首》	
		《游注佛舍，一日饮酺茶七盏，戏书勤师壁》	
		《送杭州杜、戚、陈三掾罢官归乡》	
		《元翰少卿宠惠谷簾水一器、龙团二枚，仍以新诗为贖，叹味不已，次韵奉和》	
		《次韵周长官寿星院同栈鲁少卿》	
		《次韵述古过周长官夜饮》	
		《述古以诗见责屡不赴会，复次前韵》	

年份	散文	诗歌	词
熙宁六年		《胡穆秀才遗古铜器，似鼎而小，上有两柱，可以覆而不蹶，以为鼎则不足，疑其饮器也，胡有诗，答之》	
		《贺陈述古弟章生子》	
		《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买妾，述古令作诗》	
		《书双竹湛师房二首》	
		《宝山新开径》	
		《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	
		《吊天竺海月辩师三首》	
		《李颀秀才善画山，以两轴见寄，仍有诗，次韵答之》	
		《雪后至林平，与柳子玉同至僧舍，见陈尉烈》	
		《夜至永乐文长老院，文时卧病退院》	
		《和钱安道寄惠建茶》	
		《钱安道席上令歌者道服》	
		《惠山谒钱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湖》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	
		《法惠寺横翠阁》	
《雪齐》			

年份	散文	诗歌	词
熙宁七年	《书赠法通师诗》	《元日过丹阳明日立春寄鲁元翰》	《行香子·携手江村》
	《贺翰丞相再入启》	《古缠头曲》	《卜算子·蜀客到江南》
	《刚说》	《刁同年草堂》	《画堂春》
	《故龙图阁学士滕公墓志铭》	《刁景纯赏瑞香花，忆先朝侍宴，次韵》	《蝶恋花·雨过春容清更丽》
	《跋蔡君谟书》	《同柳子玉游鹤林、招隐，醉归，呈景纯》	《蝶恋花·春事阑珊芳草歇》
	《钱君倚哀词》	《景纯见和复次韵赠之二首》	《少年游·去年相送》
	《题伯父谢启后》	《柳子玉亦见和，因以送之，兼寄其兄子璋八首》	《醉落魄·离京口作》
	《与常》第一简	《子玉家宴用前韵见寄复答之》	《浣溪沙·倾盖相胜白头》
	《与周开祖》第一简	《景纯复以二篇一言其亡兄与伯父同年之契一言今者唱酬之意仍次其韵》	《浣溪沙·炙手无人傍屋头》
	《跋蔡君谟书海会寺记》	《柳氏二外甥求笔迹》	《鹊桥仙·缙山仙子》
	《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	《成都进士杜暹伯升出家名法通往来吴中》	《虞美人·湖山信是东南美》
		《子玉以诗见邀同刁丈游金山》	《菩萨蛮·玉童西逐浮丘伯》
		《送柳子玉赴灵仙》	《述衷情·钱塘风景古今奇》
		《监洞霄宫俞康直郎中所居四咏》	《清平乐·清怀浊汴》
		《刁景纯席上和谢生二首》	《南乡子·回首乱山横》
	《饮湖上初晴后雨》	《减字木兰花·晓来风细》	

年份	散文	诗歌	词
熙宁七年		《和苏州太守王规父侍太夫人观灯之什，余时以刘道原见访，滞留京口，不及赴此会，二首》	《浣溪沙·缥缈危楼紫翠间》
		《书焦山论长老壁》	《昭君怨·谁作桓伊三弄》
		《留别金山宝觉、圆通二长老》	《占春芳·红杏了》
		《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	《减字木兰花·双龙对起》
		《杭州牡丹开时仆犹在常润周令作诗见寄次其韵复次一首送赴阙》	《减字木兰花·云鬓倾倒》
		《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	《菩萨蛮·娟娟缺月西南落》
		《新城陈氏院次晁补之韵》	《江城子·翠蛾羞黛怯人看》
		《常州太平寺观牡丹》	《菩萨蛮·秋风湖上萧萧雨》
		《无锡道中赋水车》	《劝金船·无情流水多情客》
		《虎丘寺》	《南乡子·东武望馀杭》
		《刘孝叔会虎丘，时王规父斋素祈雨，不至，二首》	《浣溪沙·白雪清词出坐间》
		《苏州闾丘、江君二家雨中饮酒，二首》	
		《次韵沈长官三首》	
		《戏书吴江三贤画像三首》	
		《过永乐文长老已卒》	
	《安平泉》		

年份	散文	诗歌	词
熙宁七年		《僧惠勤初罢僧职》	
		《游灵隐高峰塔》	
		《八月十七日，天竺山送桂花，分赠元素》	
		《次韵答元素》	
		《海会寺清心堂》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茶，有怀子由弟二首》	
		《青牛岭高绝处有小寺人迹罕到》 《梅圣俞诗集中有毛长官者，今于潜令国华也。圣俞没十五年，而君尤为令，捕蝗至其邑，作诗戏之》	

\*以上作品编年，主要参考自《三苏年谱》、《苏轼词编年校注》